# 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个人自制版）

王力雄著

**版本说明**

本文档《与达赖喇嘛的对话》一书属于个人自制版，缺少目录，原书详细篇目不详。内置篇目来源于网络整理，其中以刘晓波书评作为书序，以方便读者首先能对全书内容有一个初步、全面的了解。紧接着就是本书核心篇章《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以及依据刘晓波书评所说的2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而王力雄《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一文因也属于探讨西藏问题所以添加入本书。随后的两次由王力雄组织的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推特对话的整理文也附在本书，方便读者对于后续作者与达赖喇嘛互动交流情况的了解。最后两文是流亡学者茉莉拜访达赖喇嘛时的访谈录，以及她对本书的书评，因都与所讨论话题相近故附文与本书末。

同时希望有条件阅读实体书者，能上传完整版本。

# 刘晓波：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承蒙人间出版公司的信任，请我为力雄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写篇书评，使我有幸在此书正式出版之前，读到了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即力雄在美国与达赖喇嘛的四次面对面的交谈。在力雄的记载中，他对四次见面过程的详尽描述，在为读者提供了平易亲切而又睿智高贵的达赖喇嘛的个人形象之外，更令我感动的是力雄那种始终如一的韧性、发自内心的对西藏文化的热爱、良知闪烁的忧患意识和提供可操作解决方案的智能。

正像力雄行文的一贯诚实一样，他尽量忠实而详尽地记载这四次见面过程，同时又省略了那些达赖喇嘛在无数场合一再重复的谈话。他也描述了在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上，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明星的无奈和尴尬，并以“追星族”自嘲。力雄在内心深处很讨厌把达赖喇嘛作为“明星”来炒作，对层层设岗的严密保安措施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描述这类场面的行文多带讥讽：一位气质高贵的宗教精神领袖不得不经常遭遇这类的明星式炒作，不免有些滑稽，也实在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其实，我没有资格评论此书，因为与十几次去西藏并专门研究如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力雄相比，我只能算个观光客和听众。我的关于西藏的知识大都来自书本，来自从网上看到的一些流亡藏人的言论。而我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一知半解，大都来自力雄关于西藏问题的研究着作和幻想性小说，还有聊天时他谈到的一些想法。力雄曾把一本汇集达赖喇嘛的一些演讲的书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在西藏人心中最敬畏的宗教领袖，这位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政治家和精神导师，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面对西藏的文化和人权的双重灾难，他作为被迫害民族的领袖对迫害者所怀有的，不是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号召自己的人民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而是仍然坚持平和、宽容的中间路线。这样博大的胸怀，也常常在他对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中得以展现。因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中的许多人，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仍然抱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

最近，我还看到达赖喇嘛的一篇支持天安门母亲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短文，他说：“我懂得，天安门母亲已经卓有成效地凝聚于她们抗争的中心，与此同时，她们互相之间提供了实际援助和道义支持。我乐于支持她们，并且鼓励他人以其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支持。我祈愿，天安门母亲的努力将带来成功的喜悦，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的每一个人创造一个机缘，使他们生活在更大的和平与尊严之中。”每每读到达赖喇嘛的言论，心中都会产生莫名的感动和敬仰。与对达赖喇嘛的温和呼吁置之不理的僵硬的中共政权相比，与对“大中国情结”近乎狂热的中国精英们相比，与那些以受害者的处境和圣战为借口而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恐怖屠杀的原教旨主义者相比，达赖喇嘛的宽容姿态、非暴力立场和高尚的道义情怀，便显得更为难能可贵，其精神上的高贵确实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

我在1993年去过一次西藏，最深的记忆有三。一是西藏的大自然：天，蓝得透明高远；山，石头裸露得峥嵘；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在太阳下白得刺眼；山间的溪水，清澈得冷透骨髓。二是普通藏人：他们可以随地大小便，可以在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丰盈的精神幸福，可以把一年挣到的辛苦钱一咕脑地捐给大昭寺，磕一串长头后回家睡个好觉。三是宗教精英：我见过西服革履的活佛，坐着进口的皇冠轿车，去歌厅唱卡拉OK；在几个寺庙里见过年幼的出家人手捧英语读本，口中念念有词；还见过8岁时的葛玛巴，他有一群侍奉于左右的喇嘛和一个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他还有一大堆电动玩具。当时，对这位小活佛的感觉有些怪异，他来内地受到规格极高的接待，江泽民亲自出面会见了还是孩子的葛玛巴，而后来他的自愿出走投奔达赖喇嘛，才使我对这个记忆中的孩子产生了面对活佛的敬意。

力雄爱西藏，二十几岁时就孤身一人进藏并攀登珠峰。走进他的家，从视觉到听觉，到处都是西藏氛围，我的妻子刘霞过生日，力雄带来的礼物是CD《喜马拉雅》，因为他知道我的妻子也爱西藏。力雄常把刚刚写就的关于西藏的文字传给我，除了《天葬》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和《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均见《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写就这些文章时，力雄还没有见过达赖喇嘛，但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讲，他对达赖喇嘛的敬慕已经渗透在他的所有文字中和言谈里，西藏在地理上的顶峰是喜马拉雅，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人精神上的喜马拉雅。力雄甚至认为，如果中共政权能够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使西藏问题得以和平解决，那么汉人也应该能够接受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中国的领袖，哪怕仅仅是作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乃是汉人和藏人的天赐福音。因为就当前中国的政治精英而言，在智慧、良知、学识、经历、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的综合素质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望达赖喇嘛的项背。从解决西藏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的角度讲，力雄认为，既然达赖喇嘛明确承诺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高度自治，那么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方式，就是趁着达赖喇嘛在世之日，尽早开始双边的和平谈判。

正如力雄喜欢孤身一人的探险旅行一样，足迹遍及中国那些人迹罕至的角落，他在精神领域也是个喜欢冒险的痴情探索者。他发表于《今天》上的早期小说《永动机患者》就是他的自画像。只有他，能在十几年前就写出至今仍然畅销的政治幻想小说，使“黄祸”成为常用的政治词汇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用语之中；只有他，能从整个中国和藏汉两个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构想出让达赖喇嘛作为未来中国的精神领袖；只有他，能够形成“逐级递选制”的方法论假设，并坚持不懈地探索、完善，二十多年如一日。

他那么痴迷地把解决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寄托在精英阶层对“逐级递选制”的接受上，他着专文谈怎样把“逐级递选制”应用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还希望象当年的梁漱溟搞乡村建设运动那样，说服一个地方官允许他先做小范围的“逐级递选制”的操作试验。为此，他还冒着政治风险开办了“递进民主”的个人网站，供社会各界讨论未来中国的远景和当下转型的最佳方式。这一切，在在证明了力雄在骨子里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然而，在怎样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怎样保证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的事关全局的问题上，力雄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无论是何种解决方案，其道义底线只能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人民的未来幸福。力雄是极少数没有大汉族偏见的知识精英。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研究，他与藏人的交流，以及此书记载的他与可尊敬的达赖喇嘛的见面，皆是基于兼顾道义底线和现实困境的立场。在力雄看来，从道义上讲，无论是选择独立还是选择高度自治，西藏人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的权利，乃为天经地义，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

但是，从现实的角度讲，现在的西藏毕竟在中国版图之内，中共统治西藏毕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汉人中的绝大多数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与执政党基本相同（正如在台湾问题上一样），现在的利益至上的汉族世俗化浪潮对西藏的大城市和上层精英的冲击越来越大，就现实的力量对比来说，藏族对汉族的弱势是极为悬殊的。即便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讲，近年来汉人的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强烈决不亚于藏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所以，藏人选择独立，尽管在道义上理由充足，但是全无任何现实上的可能性。即便在中国成为民主制政体之后，民选的政府和大多数汉人也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的版图内分离出去。如果藏人不顾现实而执意要独立，其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而力雄所探索的解决之道是为了得到双赢的结局。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和道义之间的乖谬，力雄才要把这种严酷的现实困境坦率地告诉藏人，让藏人面对现实，寻求和平解决之道。他甚至把自己在西藏收集到的文革照片送给达赖喇嘛，这些历史见证非常珍贵，只有深得藏人信任的汉人才能得到。照片记载了那些在批斗场合被戴高帽画花脸的西藏贵族，其中还有达赖喇嘛很熟悉的人。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八廓街游行，宣传画上的“翻身农奴”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被小丑化的人：达赖和班禅。其实，力雄通过这些照片最想告诉达赖喇嘛的是：在文革中，大量的藏人参与造反，藏人批斗自己的活佛、亲手砸毁了自己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虽然发动造反运动的是汉人，文革中西藏宗教的大破坏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但是西藏文革的历史真相也并不像在流亡藏人中普遍相信的那样，破坏西藏宗教的主力是汉人红卫兵。

力雄赞同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但是关键在于怎样说服中共高层相信达赖喇嘛不谋求独立是真诚的。他向达赖喇嘛建议：不能让“中间道路”只停留在口号上，因为中共拒绝与流亡政府谈判的借口之一，就是“中间道路”只是停留在抽象空洞的口号上。所以，必须使之具体化细节化，要让中共看到道义与现实兼顾的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有了详尽的方案，中共就没有借口指责“中间道路”缺乏诚意。在不放弃高度自治这一最后底线的前提下，现在最关键的工作是：一要改变目前中共不见不谈的僵硬态度，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中共开始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谈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有希望。二要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和西藏现状的研究，让中国的精英阶层了解西藏问题的真实面貌，改变他们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减少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压力。为此，力雄提出办一份中立的能够让大陆精英们读到的民间刊物，刊名就叫《中间道路》。

同时，对中共政权和中国的精英阶层，力雄也是从兼顾道义和现实的立场出发。他从道义上为藏人所应该具有的自治权利辩护，批评中共政权对西藏的强权统治，批判中共通过的世俗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管齐下对藏族的宗教文化的汉化。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力雄对中国精英阶层的大汉族主义和西藏文化在中共执政后的衰落，深感忧虑，对那些靠炒卖表皮的西藏之奇风异俗的商业化更是深恶痛绝。

从现实的角度讲，王力雄想告诉中共政权和汉人精英，西藏问题在今天的困境之根源，首先是中共政权破坏了“十七条协议”的承诺，不尊重藏人的自治权利和文化传统，强行在西藏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革”造成的，特别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在藏人心中留下的伤痕很深很深。其次是中共采取收买和高压的两手政策的失败之结果。对于一个以信仰为生命核心的民族来说，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累积高达400多亿的无偿财政优惠，无论是强制灌输世俗意识形态还是禁令、监狱、军队等政治高压，都无法收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敬仰和忠诚，都无法使虔诚的信徒低下仰视神灵的头。噶玛巴放弃中共政权给予的丰厚优惠而出走印度，无数藏民冒着巨大人身风险而投奔达兰萨拉，坚守在西藏的信徒进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在在明示着一个难以被物质利益同化、更难以向强权镇压屈服的宗教民族的灵魂，这种来自信仰的高贵将使任何世俗手段失效。

如果中共政权还不面对现实，如果汉人精英还不扪心自问，西藏问题非但无法和平解决，反而可能随着中共政权控制力的日益消弱和民族仇恨的愈演愈烈，而酿成两败俱伤的暴力冲突。更为具体的现实是，如果达赖喇嘛遭遇不幸，以他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将难以为继，坚决主张暴力反抗的激进年轻一代就会成为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流，以中共执政后在西藏制造的文化灾难和人权灾难之深重，激进派不愁找不到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反抗的资源。

现在，趁着中共还能控制局面，趁着主张非暴力的中间路线的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进行江泽民和达赖喇嘛的直接对话、谈判，经过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达成双赢结果的概率极高。首先，只要签署了协议，以达赖喇嘛在西藏的神圣地位和一言九鼎的崇高权威，他完全能够说服藏人接受留在中国之内实行高度自治的方案，使坚决主张独立的激进派边缘化。其次，可以大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而且以达赖在国际上的广泛威望，也完全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可以成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最佳使者。第三，以达赖的中间路线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核心，可以为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其它民族问题提供示范，免除将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爆发大规模分裂运动的危险。第四，达赖喇嘛构想的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一个政教分离的民主西藏，这种民主试验已经在流亡政府的辖区内进行。而且，在达赖喇嘛的有生之年，以他的智慧和威望自上而下地进行民主试验的成功率极高，如同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做的一样。这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转型将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第五，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中共开始与达赖喇嘛谈判之日，也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

对于西藏问题的久拖未决，力雄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因为他对西藏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具有一种多元化的开阔的文化视野。他说：“不能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就可以安慰自己，而是要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西藏时，就能够解决西藏问题，那才是有意义的解决。”换言之，如果等到西藏的文化传统已经荡然无存之时，西藏问题解决了，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西藏却消失了。那就不仅是藏人和汉人的双重失败，也是世界的一大损失。

我很为力雄庆幸，他对西藏的热爱和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终于得到了藏人的重视，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肯定：流亡藏人主动提议力雄与达赖的见面，安排和一直陪同力雄见达赖喇嘛的WA，在四次见面结束后总结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达赖喇嘛第一次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续四次接见同一个人。

力雄得到藏人的信任和尊重的亲身经历、他笔下记载的达赖喇嘛的形象，都在告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汉人：达赖喇嘛的高贵质量，来自对神的虔诚和谦卑、对人的尊重和慈悲，对对手的宽容和平和。那么，作为强势民族的汉人，也应该持有类似的情怀：对西藏宗教文化的谦卑和尊重，对藏人的平等和友善，对达赖喇嘛的信任和敬重。

既然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西藏问题又是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政治体制问题的钥匙，那么借力雄的新书给我的机会，我也向达赖喇嘛表达一个汉人的谦卑敬重，并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的长寿而祈祷。

2002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 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

我即将启程去美国参加一个汉藏交流会。感慨万千。希望参与“汉藏交流会”的人们，尤其是主要参与者、组织者，读一读此文。——朱瑞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

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共产党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暗含得意地告诫，鞘恰澳诓慷廖铩保挥小肮患丁辈旁市砜础?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岳斫夂涂砣萏戎鞫罢沂迪侄嘤耐揪丁?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中午LD请我在他家附近一个泰国餐馆吃饭，席间透露达赖喇嘛不久前给北京当局一封信，希望开展对话，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北京的反应。为了创造好一些的气氛，避免给北京刺激，原来安排好的达赖喇嘛第二次台湾之旅也决定暂时搁置。他问我对前景有何估计，对此我不乐观——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进展，但那除非是奇迹，而奇迹是不能寄托期望的。我说，目前不是北京想不想拿出新东西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新东西可以往外拿。强硬的一套，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到极致；温和的一套，也不可能再超过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推行的“六条”。二者都没有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且都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堆新问题。北京对西藏问题已经找不到新思路，因此对它唯一可行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西藏在它手里，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它所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指望它会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呢？对话不是见面谈谈那么简单的事，首先需要知道对话以后怎么办，以及能够怎么办。没有新的思路，单纯为对话而对话反而可能使北京陷入被动。

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历史上西藏也曾对力图与其对话的英国采取不理睬对策。英国人那时甚至要专门派人向西藏的边境官员朗诵致西藏政府的信，以期他们能把听到的内容向拉萨复述，因为拉萨拒不接受来自英国的任何信件。此刻感受LD透露出的与北京对话的渴望，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历史变化。今天的流亡西藏彻底开放了自己，却似轮回报应一般遭遇到死不对话的对手。然而和当年不同的是，对于西藏的不对话，大英帝国最终可以派遣“武装使团”一路打到拉萨，逼迫西藏与其对话。但今天的流亡西藏面对强大的中国，只能苦于无计可施的百般无奈。

那次见面之后，LD去了东欧。正好接近美国总统选举，我去美国其他地方旅行观看竞选情况。大选日之前，我回到华盛顿等看最后投票。那时LD也从东欧回来了，我们约在市中心一个饭馆见了第二面。LD告诉我他已经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我上次和他的谈话，达赖喇嘛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就是这一次见面，LD问我能不能安排一个时间与达赖喇嘛见面，亲自谈一谈。他说达赖喇嘛非常需要知道汉人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的真正想法，以及从汉人整体的角度对西藏问题到底如何认识。

同时，LD向我表示，达赖喇嘛提出西藏不搞独立、留在中国、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决非是一种口头宣传，而是非常诚恳和认真的。他还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中间道路，实际上还是要搞独立的话，我们就不会和你打交道。因为对西藏独立的事业而言，你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威胁。反而是中共的统战部，他们做的事情才真正对西藏独立有利。”我明白他这话的意思是说统战部的所作所为总是刺激藏人的不满情绪，客观上也就起到了把西藏从中国越推越远的效果；而我做的事是竭力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把两个民族往一块拉，当然对真正搞独立的想法就是不利的。

我回答LD，能够见达赖喇嘛是我的荣幸，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愿意。对解决西藏问题，我一直认为达赖喇嘛是关键因素，能当面跟他谈我的想法，说不定会对他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考有所帮助。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个人的好奇，以及就研究西藏问题而言，能够亲见达赖喇嘛都是难得的机会。

谈到具体安排，LD最初想法是安排我去印度。后来改成了去东南亚，利用达赖喇嘛在东南亚访问的时间见面。过了几个月，又通知我改为在美国。达赖喇嘛将在2001年5月访问美国。若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最希望的见面地点是印度，因为达赖喇嘛在那里的时间会比较充裕，彼此见面和交谈都可以做到从容与深入。而利用他出国访问的机会见面，只能在他已经排满的日程中插空，将会非常地匆促。后来情况果然是这样。

2001年春天，我收到美国一个援助西藏组织的邀请信，邀请我去美国进行关于西藏问题的研讨。美国领事馆的签证官读罢邀请信，很注意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没问题”就给了我签证。我猜想也许我是他办的第一个以这种邀请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

到华盛顿后，我还是住在WA家。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几次都住他家，已经是朋友的感觉。第二天LD到WA家，我们一起吃WA做的饭，那是藏式、西式和汉式风味的混合，很独特。

按照原来的安排，我应该在5月25日到27日这三天中的某一天在洛杉矶和达赖喇嘛见面，具体时间要根据达赖喇嘛的日程安排再定。这次LD告诉我，他把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分成两次，第一次是在华盛顿见，时间不会太长，主要是礼节性的，彼此认识一下，我可以先提一些问题。第二次见面是在洛杉矶，因为达赖喇嘛在那时间相对比较宽裕，主要谈话安排在那里，时间可以长一些。而且两人已经见过面，可以算作朋友了，第一次见面提到的问题也有过思考，谈话就会比较充分。

我对LD提了一个问题，与达赖喇嘛的见面和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公开。他回答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忌讳，因为这中间没有什么秘密，但他们不会主动往外说，主要是考虑我的安全，至于我自己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我问这话，倒不是出于采访和发表的目的，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等我回到中国，“有关部门”知道我有过这次见面，在审问中如实地回答对我应该是最安全的，反而越是回避躲闪越会显得可疑。LD没有要求我保密，我因此感到轻松。

加上这一次，我和LD只见了三次面，但是我挺佩服这个人，也完全能够理解达赖喇嘛为什么如此倚重他。他头脑清楚，思维缜密，亲和力强。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的成功，他的贡献很大。据说他原来曾经在流亡政府做过首席噶伦，后来放弃官职，专做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他平时常住美国，达赖喇嘛的很多事务，尤其是和美国政府的交往，还有流亡西藏与中国政府的接触等重大问题都要通过他。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访问，他几乎总是要亲自安排和陪同。

与LD见面后，我去纽约、波士顿等地，其间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讲座——谈对“十七条协议”的评价。2001年是北京与拉萨签订“和平解放”协议（即“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北京大搞庆祝，而流亡藏人认为那是武力逼迫下的不合法条约。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会后一位与会的藏族女士对我说，我这番谈话她还能接受，但是以前我在西藏问题上发表的意见，被认为起到了给中共献计献策的效果，帮助中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另一位哈佛法学院的藏族男士则对我说，他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西藏问题研讨会，原定邀请我参加，同时也邀请了中共统战部官员，但是统战部官员表示有我参加他即不参加，所以只有下次才能邀请我。我对自己两头不讨好的位置感到好笑。我回答藏族女士，统战部方面也会认为我是给流亡西藏献计献策呢。不过我不是春秋战国那种“策士”，谁给好处给谁献策，我希望各方都赢也不是无原则的。我所希望做的，归根结底是要避免和化解民族冲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幸福。

5月23日，正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再一次来到华盛顿。达赖喇嘛已经在华盛顿，而且就是这一天和布什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见。

我和达赖喇嘛见面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2001年的5月24日。那天天气非常晴朗，阳光强烈。见面时间安排在上午10点。WA领我乘地铁去达赖喇嘛下榻的 PARK HYATT饭店。因为时间上打出了很多提前量，我们有足够时间先在附近吃早餐。PARK HYATT饭店周围可以看见三五成群穿藏装的藏人，其中不少是一家人。在见我之前，达赖喇嘛先接见住在华盛顿的藏人。饭店内外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似乎都与西藏或达赖喇嘛有关系，或是试图有关系。达赖喇嘛在美国人心目中除了是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还算得上是个明星。美国好几个当红影星、歌星都是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算得上明星中的明星，自然会有很多追星族。

见达赖喇嘛穿什么衣服是个难题。我从未穿过成套西服，也不会打领带。最后决定穿中式衣服。中式衣服不像穿西服那么麻烦，上正式场合也无问题，因为是民族服装嘛。西服容易被人看出各种毛病，我的中式衣服虽只花了30元钱，别人却说不出什么。可是当我们到了饭店，WA却意识到我的中式服装可能是一个问题，因为格外引人注意——一眼就能被看出是中国人。如果穿西服，再不合体也不会引起注意，无非是个邋遢点的普通亚裔人而已。中式服装在这种场合却比较敏感，因为西藏问题是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来到达赖喇嘛下榻处是怎么回事呢？注意的人肯定都会有这个问号。WA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被摄像或拍照，可能性当然会有。对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不应该没人进行监视，也许他们就在周围吧。不过已经走进饭店，再想这些也没有用，只能不管了。

饭店里面戒备很严。达赖喇嘛的保卫由美国政府提供，从一楼开始就有守卫，还有牵着狼狗的保镖。我们乘电梯上到达赖喇嘛下榻的楼层，先到一个房间等候。一些人在那房间里工作，其中还有人带着孩子，因此气氛不显得紧张。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那里。上次到美国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1987年到拉萨旅游时正好碰上了拉萨“骚乱”，他目睹了整个过程。结果那次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投身国际援助西藏的运动。这个人给我印象很好，单纯善良，理想主义，但是不极端，我们挺谈得来。WA还给我介绍了达赖喇嘛的一个秘书。他原来负责达赖喇嘛安全，刚转做秘书，英俊挺拔，西服革履。

正谈着，突然有人十万火急地进来，示意我们马上过去，催促得十分紧迫。我们赶紧起身相随。达赖喇嘛下榻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总统套房”吧。门口站着一堆保镖。我们去时大门已经打开，里面也有一堆人，感觉是黑压压一片。在那些人中，一眼就能看见达赖喇嘛。他站在中间，穿着红色袈裟，微微驼着背，全神贯注地向外看——正是他的典型形象。我原以为会进到一个类似客厅那样的地方才会见到他，没想到他会站在门口等我。后来知道，他是刚见完华盛顿的藏人，从他的专用电梯上来。那电梯在总统套房之内，但是靠近大门，离他自己的房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站在门口等我过去。他的随从催促那么紧就是这个原因——让达赖喇嘛等候已经有些过分，更不能让他等的时间太长。

我对达赖喇嘛双手合什，问候藏语的“扎西德勒”。达赖喇嘛则用汉语对我说“你好”。他的声音爽朗宏亮。我们接着握手，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是双手握在一起。达赖喇嘛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仔细看我说“我知道你啊，你的文章我看过，见到你很高兴”。他用藏语说，WA给我翻译。我也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往他房间走。那一段路给我的印象深：一条很长的走廊，灯光明亮，两边有很多房间，大概总有十几个门。每个门前都站着一个美国政府派的保镖，个个深色西服，身材魁梧，短发型，耳朵上有耳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守住每个门口，难道是为了防止里面有刺客冲出？达赖喇嘛拉着我的手穿过那条长走廊。一个穿红袈裟的喇嘛，一个穿蓝褂子的中国人，后面是一群人沉默相随，让我感觉有点像电影镜头。达赖喇嘛的手温暖而饱满。

进入达赖喇嘛客厅，我按藏族礼仪献哈达。达赖喇嘛接过哈达放在一边。我们坐下来。达赖喇嘛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他开始笑，没说什么，突然伸手把我拉过去。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以为他要在我耳朵边说点什么话，心里还在猜他要说什么，担心他说藏话我也听不懂啊。没想到他是把他的头和我的头相碰在一起，碰了很久，十几秒还是二十几秒。我虽然没有觉得一股热流涌进全身什么的，但我知道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加持，尤其是从佛教角度，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除了我和达赖喇嘛，在场的还有WA、LD，以及达赖喇嘛的大秘书。大秘书看上去五十多岁，戴眼镜，个头不高，据说是西藏一家显赫贵族的后代。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达赖喇嘛很会说话。他每天在各种场合说话，练出来了。他的谈话逻辑清楚，一环扣一环，用词既准确又简单。此前听了解情况的人说过，达赖喇嘛以往跟汉人见面，难得有深入交谈。他有时爱回顾历史，说到五十年代西藏怎么回事，如何见毛泽东等，那些汉人的兴趣就集中到那上面，几个问答下来，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结果那样的见面往往是礼仪性质大于实际意义。因此我的打算是不向他提问题，也不进行采访。限于我能和他交谈的时间，实在问不了多少问题，也采访不出来什么，莫不如尽可能地用来说我想跟他说的话。LD之所以花了那么多力气安排我和他见面，就是希望我能跟他讲一些他从别人那里听不到的话。

这次见面限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其中用于翻译就需要一半时间，因此在达赖喇嘛讲话之外，我没有几分钟可以说话。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对此，达赖喇嘛用开玩笑的口气说，我现在只谈西藏问题，都被说成是分裂分子，要是再去涉及中国的事情，不知道又该会被扣上什么帽子了。不过玩笑归玩笑，他也不反对这种基本判断——只有在中国问题解决以后，西藏问题才有可能获得真正解决。

那次见面有一个奇怪的插曲，我和达赖喇嘛刚开始谈话，没说几句，房间里的火警报警器突然叫起来。外面的保镖跑进来检查，报警器里还听见有人说话，似乎是中心控制室也在检查，忙成一团。达赖喇嘛停止讲话，询问发生了什么。但人们检查不出问题在哪，也没有办法让报警器停止鸣叫。达赖喇嘛只好在警报器叫声中继续谈话。一个保镖不得不用手捂住报警器，让声音小一点。我感觉足有十多分钟，那个错乱的报警器才被制服，安静下来。

预定时间很快就到了。LD和达赖喇嘛的秘书开始频频看表，最终明确告诉我们需要中止。我在告别前送给达赖喇嘛一套记录西藏“文化大革命”场面的照片。那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藏人在文革中拍的。西藏留下的文革遗物非常少，所以这些照片很珍贵。达赖喇嘛兴致勃勃地把每张照片都看了一遍。他认出了其中一些带着高帽、画着花脸挨斗的人，是他过去熟识的贵族。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红卫兵扛着大幅的宣传画在帕廓街游行，画的是“翻身农奴”正在拿着大扫帚横扫两个小丑模样的人，一个是达赖，一个是班禅。达赖喇嘛不时发出笑声，但是在看到一个藏族特征非常明显的女红卫兵正在挥着撅头砸大昭寺金顶的照片时却没做出任何反应。由藏人动手砸供奉了千百年的寺庙，那段历史始终是一个未解的困惑，即使对达赖喇嘛也是一样。

我们刚一离开会客厅，就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下一拨来见达赖喇嘛的人。那些人扛着各种电视设备。WA告诉我走在前面的是美国最著名的黑人女主持。我们擦肩而过，其间空隙是以秒记的，可见达赖喇嘛日程安排的紧张程度。

LD一块出来，我们在楼下酒吧坐了一会。他不能陪达赖喇嘛去洛杉矶了，因为达赖喇嘛刚刚会见布什总统，有许多事情需要他留在华盛顿处理，所以就在这里跟我告别。他说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能够成功地安排我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为此感到欣慰，并希望到洛杉矶之后，我和达赖喇嘛能有更深入的交谈。我对他表示了衷心感谢。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见面时间到了，我们从会堂侧门进去。那个侧门临时作为达赖喇嘛的专用出口，外面戒严，里面也有保镖守卫。我们被引进讲台旁的休息室。休息室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光线也不够明亮，跟达赖喇嘛在华盛顿下榻处的气派没法相比。一进去，看见达赖喇嘛盘腿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他起身迎接，伸出没穿袜子的光脚去套沙发下面的拖鞋。那是卡在脚趾上的那种便宜拖鞋，橡胶材料，在中国一般只有民工才穿。达赖喇嘛这回是像是见到熟人一样与我握手，拉我在沙发上坐下。那天除了WA和BQ在场，还有达赖喇嘛的秘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的主任。我在去年波士顿的族群研讨会上见过他，是个笑口常开、和蔼可亲的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演讲。我就像一个追星族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赶场机会。我的确对这个西藏喇嘛感兴趣，希望能在各种场合观察他。

一个当地朋友为我开车和翻译。我们从饭店出门时正好碰上达赖喇嘛出发，安全人员临时禁止其他人出入饭店大门，清出一条通路让他从大堂出门登车。他在为两侧人群祝福时看到了我，彼此一笑，没有说话。

演讲场地是在大学体育馆，每张门票6美元。一个藏人喇嘛在售票处窗前徘徊，嫌门票太贵。我把多的门票送给了那位喇嘛。我有时试图猜一下，达赖喇嘛的类似收入会有多少，又是怎么使用和分配的？以他的明星效应，如果有好的经纪人，财源滚滚应该不成问题。他自己虽然不需要钱，流亡西藏却需要，他若是利用商业手段和明星效应为流亡西藏搞钱，可以理解。但是据说他非常反感把自己的活动和金钱联系在一起，经常做不要钱甚至贴钱的事。信徒奉献给他的供养，往往转手之间又被他送给别人。听说达赖喇嘛去台湾时，要求所有在台湾收到的钱都留在台湾。台湾人的供奉非常丰厚。西藏流亡人士常常眼看大笔已经到手的钱随即被达赖喇嘛送出去，不免暗暗心疼，那些钱可以给流亡西藏做多少事呀！

体育馆很大，座位坐满了一大半，下面的比赛场地也临时摆了很多排凳子。新闻报道说大概有两万多人来听演讲。演讲开始之前，悬在体育馆上方的大屏幕一直在放一部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达赖喇嘛认定的转世班禅——影片把他称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有不少名人在影片中出镜，其中图图主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自由比镇压要便宜”。我对此深为认同，如果中国给西藏高度自治，花的钱会比现在少，效果却会好很多。

达赖喇嘛出场前，观众席上的光线暗下来，演讲台则打满舞台式的强烈灯光，完全是戏剧开演的效果。等到达赖喇嘛出场，全场集体起立鼓掌，他却被头顶灯光晃得什么都看不见，不得不用双手搭在额前挡光去看台下并还以致意。他的举止天然，毫无造作。在当今这个把一切都搞成舞台样式的传媒时代，政客在台上只会刻意地表现自己。而他的魅力却恰恰是没有任何刻意（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刻意最聪明，就是表现不刻意）。台中间一个孤零零的椅子，被舞台效果的灯光照得雪亮。任何人坐上那椅子，面对周围的黑暗却知道黑暗中有几万双眼睛盯着自己，都难免手足无措。而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坐在椅子上盘起双腿。观众对他这个动作发出善意笑声。他们在自己的公众人物身上很难看到如此洒脱。我对这动作是熟悉的，无论是在华盛顿的总统套房，还是在洛杉矶讲经会堂的小休息室，他都是这个姿势。他总是赤脚穿拖鞋，大概就是为了方便随时脱鞋打盘腿吧。西藏人，尤其是西藏的僧侣，最自如的姿势就是盘腿打坐。我想他在那舞台上一打起盘腿，就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达赖喇嘛的演讲用英语。他的翻译坐在旁边，仅仅是在他有不会的单词时给予提醒。体育馆上方的悬挂四个面的大屏幕，向四个方向同步地播放他的特写镜头。他的演讲是关于人生智慧的一些话题，我已经记不清具体内容。我感兴趣的是西藏政治问题，但他对西方公众一般不讲政治，多是讲人生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征服西方公众，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形象是智者和宗教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受压迫民族的代表。单纯从政治角度获得同情是有限的，这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那么多，诉说民族苦难和为自己民族鼓呼的人也很多，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公众的兴趣？因为需要同情的苦难和需要谴责的不公正实在太多了，都向西方人去说，他们根本听不过来，而且天天让他们为此付出，到一定时候也就疲倦甚至厌烦了。然而达赖喇嘛不同。他令西方公众感受到的不是要求他们付出，而是给予他们，是他们的获得，让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从达赖喇嘛那里得到人生方面的指导，哲学思想的提升，以及宗教情怀的满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热情地欢迎和爱戴他。

达赖喇嘛是聪明人。他自己不谈西藏问题，并不是西藏问题就被忽略了，而是那些话题自会有人去为他说。就像这次演讲，前面播放的纪录片把西藏问题已经煽情地渲染了一番，接着大学校长在达赖喇嘛演讲前所做的开场白，也是谈西藏政治问题。这已经是通例。但凡达赖喇嘛出现的各种场合，总是先由西方社会的著名人物、议员、明星等做介绍，无一不是大谈西藏问题，表示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号召西方公众支持西藏自由运动等。于是当他开始讲话时，就闭口不再提那些。既然已经有人替他讲了，自己何必再讲，让别人讲不是更聪明吗？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尽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年1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三次见面时间安排在5月27日早上九点。达赖喇嘛每天起床先要念经修法，然后是讨论工作和早餐。在见我之前他先有一个会见，然后跟我谈，再去法会讲法。这次见面地点是在饭店他的房间。我和WA先去BQ的房间等待。BQ的房间和达赖喇嘛的房间在同一层，相隔不远。

等候时，达赖喇嘛让他的藏汉语翻译——一个二十多岁的台湾和尚先过来跟我聊天。不知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我和那年轻和尚没有专门话题，东拉西扯了一会。他十来岁时就被送到印度的色拉寺学习藏语和宗教，看上去天真，不谙世事。他主要是为达赖喇嘛做宗教方面翻译。这几天的传法就是他在现场翻译的。我昨天去听法会时，感觉他可以把话译的通顺，却不太能传神。以一个细节对比——法会上的美国听众用耳机听英语同声翻译，但经常是听耳机的人发出笑声，听现场中文翻译的却没人笑。这个翻译太年轻，又出生在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反右之类很多事都不知道，因此不容易做好对大陆汉人的翻译。英语翻译就不同。流亡藏人中英语人才多，达赖喇嘛的英语翻译据说极其出色。然而不管感情上是否愿意，西藏人最需要了解和交流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汉人，因此发现和使用好的汉语人才，对流亡西藏而言非常重要。就我的感觉，他们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还不够。

好在给我和达赖喇嘛做翻译的是WA，让我几乎感觉不到语言障碍。很多话不用我说完，他已经按照我要表达的意思进行翻译，有些词汇我自己都把握不准，他却能给我恰当的提示。为了保证我和达赖喇嘛谈话的质量，WA中断自己的工作，横跨美国来当翻译，这一方面看得出重视和认真，另一方面也说明达赖喇嘛身边的确缺乏优秀的汉语人才。

因为这次见达赖喇嘛是额外安排的，不像上两次必须抓紧每秒时间把话说完，无法顾及其他，我就带上一本达赖喇嘛写的书，台湾译本名叫《生活更快乐》。原本只想请达赖喇嘛在书上签一个名，我回去把书送给西藏文革照片摄影者的家人，作为对照片的回赠。但是达赖喇嘛拿着书和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才开始写。不是一个签名，而是是写给我的一段藏文。WA后来给我翻译了那些话，大意是”赠给学者王力雄先生，祈愿你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探索事物的真谛，来为己为人作出广大而有益的贡献”；签名是”释迦比丘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日期是”2001年5月27日”。当然，我不会把书再送人。只是因为担心回国进关时被查出没收，我只能把书留在美国，暂时没有带回。

这次谈话我先从昨晚听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演讲说起，谈到流亡西藏运动在国际上的成功，然后谈到我对他首先是精神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的认识。我说，他作为政治领袖，仅仅是对藏民族而言，而作为精神领袖，却可以不分民族。正如他在西方公众中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精神领袖获得的。然而对汉人这方面做的却不成功。同样的话我对LD也说过。多数汉人目前在西藏问题上都和政府观点差不多，基本把达赖当作企图让西藏和中国分离的藏族政治人物，对他的宗教作用和思想精神毫无所知。这当然是与当局的信息封锁和有意扭曲有关，但也与流亡西藏把主要精力放在西方，不够重视针对中国本土和汉人的工作有关。而且在与中国方面的对话中，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话语过多，没有着重区分政权和人民，也没有有意识地在汉地民间扩大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以及在汉人百姓中培育达赖喇嘛作为精神导师的形象。另外还有一对关系该如何调整也值得斟酌——流亡西藏对西方的成功和对中国的不成功，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反比关系，即在西方越成功，在中国汉地就越不成功。因为获得西方民心所使用的那些因素，在汉地往往就成为失去民心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关系究竟怎样定位，应该重新考虑。达赖喇嘛听我发表这些意见时，不断点头。

另外，我说即使在政治范畴，目前也有需要改进之处。如达赖喇嘛提倡不求独立只求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仅他一个人这样说不够，因为如果没有详细方案和周密研究，以及操作方面的具体化，就容易流于抽象理念，甚至被认为只是口号。达赖喇嘛无疑不能自己去做具体研究，但其左右目前也少见有人做。

我举例说，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都给予国民有迁居、旅行的自由，实行了高度自治的西藏对中国也是同一个国家，那时西藏境内是否允许汉人自由往来？如果允许，藏人现在抱怨汉人大量涌入对西藏文化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怎么解决？如果不允许，与宪法的矛盾怎样解决？限制的措施又是什么？是用户口限制？还是用发护照、办签证的办法？是不是要在藏区和汉区之间建立边防和关卡？藏区有没有能力担负设立边卡的人力和资金，还是要汉区为之来建立？等等。对这些问题，我曾问过流亡政府的官员，他们没给我明确回答，看得出没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思考，更没有成熟方案。

还有，达赖喇嘛提出将来西藏实行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欣赏这种理念。然而具体而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制度？仅有理念还不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和细节描述。西藏流亡政府公布过未来西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未来西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主要从经济上区分，如果没有形成具体制度，许多障碍就无法克服。西藏境内目前仍有大批被称为“翻身农奴”的人，不能不正视他们的存在。他们一直疑虑高度自治的西藏会不会要他们把土地重新交还给过去的领主？虽然达赖喇嘛一再强调西藏不会回到旧制度，但是如果一天不明确新制度是什么，“翻身农奴”们就不会停止猜疑和担忧。

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留下的遗产，几十年时间产生出的一大批同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藏人，如党政官员、国有企事业职工、退休干部等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各个方面、甚至能否生存下去都和现体制密不可分。如果西藏实行高度自治，现体制退出西藏社会，这部分人会发生何种变化？能不能保证生存？怎么处理现体制留下的“国有单位”？能不能消化十多万集中于城市的“干部职工”？如何转化他们？方案是什么？步骤是什么？……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和周密安排，设计出平衡的配套措施。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 人们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欢欣鼓舞，什么事都好说，问题往往发生在变革实现的第二天。一旦西藏真开始高度自治，所有责任就再无他人承担，全得靠自己。每天面对十分具体的柴米油盐，缺一点都不行，但流亡西藏现在不要说做好这些准备，连细致的思考都不是很多。

我的结论是，要跳出只有达赖喇嘛一人打“中间道路”旗帜的局面，需要思考和研究相应的方案。北京现在指责“中间道路”是一种欺骗手法，先搞半独立，再作为跳板走向独立。反驳这种指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间道路”具体化，而不是像一些流亡藏人的简单回答——达赖喇嘛做了如此妥协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只有继续争取独立！那正好会被北京用来证明“中间道路”只是谈判手腕和独立跳板。而如果能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拿出可操作的方案，就比较容易向汉人证实“中间道路”的真诚，是目标而非手段。汉人多疑，是因为历史上受过的欺骗太多，习惯了猜忌。他们不会像藏人一样，对达赖喇嘛的话视为一言九鼎，而是不信口头允诺，只有看到实际作为，眼见为实，才可能逐步消除他们的猜忌。

听到这里，达赖喇嘛表示说他百分之百的赞成我的话。不过我知道不要为他说的“百分之百”得意，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我见过好几个人描述他们与达赖喇嘛的对话，都得到过达赖喇嘛“百分之百”的同意或赞成。达赖喇嘛接着开始对我具体地解释“中间道路”的内容。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我提出那些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是为举例说明“中间道路”没有进入到具体化。他似乎是认为我想得到对那些问题的具体回答，话题便转到那上。

达赖喇嘛首先谈高度自治后西藏与汉人的关系。他说曾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衡量标准，凡是在西藏出生的人，未来可以算西藏居民，有留在西藏的权利；不是西藏境内出生的人，则应该回到汉地。这种说法我以前看到过。但如果只有在西藏境内出生的人才有长期居留西藏的权利，那种人数量是非常少的。即使是户口在西藏的汉人，本人在西藏生活了几十年，生孩子也往往回汉地，因为他们认为汉人母婴不适应西藏的海拔高度，所以他们的孩子也很多不是在西藏出生。那么在西藏以外出生的人都被要求离开西藏是否合理？又是否能够做到呢？居民权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未来西藏是否允许汉人自由进入？是不是要把西藏变成香港一样，凭特别通行证才能进？香港还好说，那里原本中国人就进不去（但仍然引起内地汉人反感，说统一跟没统一没有区别），而藏区面积占中国领土四分之一，汉人原来可以自由走动，有一天却变成必须拿通行证才进得去，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达赖喇嘛接着谈西藏未来实行的经济制度，为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原因在于他对资本主义有很多不满，西方社会的物质主义给人类带来很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很多不当之处，同样造成很多问题。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最适合未来的西藏，他说那需要学者和专家们去做研究，并不是他能回答的。

按照原本时间安排，我们至少超时了二十分钟。九点半他应该去法会讲经，不过法会时间有弹性，通常前面都是唱诵和默祷，是信众进入状态的时间，那时间可长可短，因此他晚一点去也没关系。达赖喇嘛可能认为我既然是一个作家，一定需要做些采访，所以应该回答我的问题。其实我倒宁愿他说些别的，因为他回答我的，都是以前他反复谈过的定型说法，大部分我早已看过。

茶几上放着一条哈达，那是准备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送给我的，也就意味着最后告别。但是这次谈话结束时，达赖喇嘛表示中午还要再见一面，让BQ和他的秘书安排，因此哈达也就没给我。然后他背上一个黄色香包去赴法会，我们先留下，等他离开后再走。他还是光脚穿着拖鞋。我看到他刚一出门，两个早已等候的美国人就迎上前跟他握手，一左一右走在他两边。他们是被安排在去法会的路上跟他谈一会儿的。看来他的每一个时间空隙都被排满。

我十分赞叹达赖喇嘛的过人精力。六十六岁的人能够承受这样紧张的安排，足以证明身体非常健康。WA说他跟达赖喇嘛去台湾时，他们只是跟随，远不像达赖喇嘛那样一轮轮地接见、谈话、修法和传法，可是随行的年轻人都累得不行，达赖喇嘛却从无疲倦之态。由此我想到，北京方面内部吹风说达赖身体已经不行，已经在为“后达赖时期”做准备，那不是情报有误，就是一厢情愿。从他这次在美国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的活动看，他健康地再活上一、二十年应该是没问题。中共政权想和他比赛耗时间很可能是错误，因为这个政权自身能不能再挺一、二十年，是要画问号的。

出门后WA总结了几个“第一次”，即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在现场给人签字时写那么多话；第一次看见达赖喇嘛听他翻译时露出那种让他害怕的严肃神情；还有就是达赖喇嘛在如此紧张的出访日程中连着四次接见一个人，也没有过。本来担心LD没来洛杉矶，由别人安排日程不会多给我们时间，不想由达赖喇嘛自己安排，反倒增加了两次见面，结果就很圆满了。

中午吃法会供应的中餐盒饭，是免费的，大概是哪个中餐馆老板给法会的布施。中间有一件逗乐事。BQ是个素食者，拿饭时特地问清了是素餐，可是等我们找到坐的地方，打开一看，每个饭盒里都赫然摆着一只鸡腿。BQ大惊失色，匆匆去换，结果人家告诉他鸡腿是假的，实际是豆制品。他还是难以放心，因为那“鸡腿”的确可以乱真，不仅看上去无法分辨，我连吃在嘴里也不敢断言不是肉，直到吃出了木棍做的“骨头”，才最终确定是假，马上告慰BQ。BQ对我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是要吃素，又下那么大功夫作成跟肉一样，汉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对此我回答不出。

我和达赖喇嘛的第四次谈话像前一天一样，安排在讲经午休时间。我们吃完饭就去会堂，先是在摆着法座和法器的讲台上等了一会，不久达赖喇嘛的工作人员领我们进去。还是上次见面的小休息室，达赖喇嘛没到。我们都站在屋子中间等。过一会儿达赖喇嘛出现在门口。他先朝我做了一个欠身致礼。那情景我至今在眼前清晰可见。我也连忙对他鞠躬还礼。他的人格魅力重要一点就在谦恭平易，不给别人造成距离感和排斥感，而是把人往近拉，让人感觉亲密，同时却不会因此认为他没份量，他仍然是大人物，却那么亲近，仅此一点就会征服很多人。

开始谈话。我力图把上午的话题进一步阐述清楚。我说流亡西藏在“中间道路”的具体化上做得不够，可能会有自己的理由——既然中国政府完全拒绝“中间道路”，还有什么必要对其具体化？既然高度自治看不到任何希望，去想实现高度自治后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然而对此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把“中间道路”具体化，并非仅在“中间道路”实现后才有用，而是在把“中间道路”从思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就不可缺少。只有把“中间道路”具体化，才能让各方真正了解“中间道路”是怎么回事，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判断。这里还牵扯到一个方法问题，不能只看政府的态度，即使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强硬到底，也要——而且更要——努力去做争取中国人民的工作。有了这样一种前提，就不会仅仅因为北京不做回应而灰心丧气，放弃该做的事情。流亡西藏为“中间道路”所做的任何具体工作，终将被中国精英阶层认识，并通过他们扩散给中国人民。现制度不会成为中国的永远，一旦现制度退出，今天播下的种子就会在那时得到收获。而如果不去进行这种努力，其结果就等于是让多数汉人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共绑在一起，从而使中共今天对西藏的态度继续延伸到中共后的时代。在我来看，那才是最大危险。

这次见面时间比较短，大概只有半小时。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达赖喇嘛的谈话记下来。因为这几次见面，重点都在我讲给他听，我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讲上，因此很难同时再做记录。后来再回忆，达赖喇嘛讲的内容是什么，都只剩下一个大意。尤其是最后一次见面，他的话我几乎没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刻，他给我戴上哈达，对我说了一番祝福的话。我也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对他说，在我眼中，未来不仅需要他带领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带领中国。听到这话他笑了，那是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然而我这话是发自肺腑的，绝不是虚伪的溢美之词。对他而言，可能完全不希望再给自己加上一个带领十几亿人的重担，只解决西藏问题已经够叫他操心，并且他只对西藏人民负有义务，汉人的问题并非他的事情。然而我在第一次和他见面时就说过，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分不开的，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中间道路”目前对西藏的很多具体问题拿不出可行办法，常常会面临无法超越的两难处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局限西藏自身，没有把西藏和中国作为一体来考虑。因此也就意味着，要想真正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必须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只要他不愿放弃西藏，中国的担子也就得一块挑，除此别无选择。

在我来看，也许这就是天意。把西藏问题和中国问题绑在一起，就是要让达赖喇嘛有一天可以担当中国的领袖。当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那一天到来时，他能起到的作用将是独一无二、无人替代的。尽管现在我这样说，人们会笑为天方夜谭，然而达赖喇嘛不应该，他如果真能通达天意，心里就应该意识到这个使命。

最后一刻，在我们握手告别时，达赖喇嘛抱住我的双臂，把我拉近，用额头顶住我的额头，我也抱住他的肩膀。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好像很漫长，又好像很短暂。当晚他就要飞回印度，下次再见不知道会在何时何地了。我走到门口，转身再次向他合什道别，他站在原地目送我，不知为何，我的心头弥漫起一片惆怅。

在飞越太平洋回国的旅途中，我开始考虑下一步会遇到什么和能做些什么。周围旅客东倒西歪地沉睡，我在机舱的黯淡光线下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如果“有关部门”知道我和达赖喇嘛说了什么，是不是会给我定叛国罪——给达赖出谋划策，不是叛国是什么？说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滑稽，对我一无所知的LD隔着太平洋可以看出我有一颗“中国心”，随时监控我的当局却会把我视为“叛国者”。

其实在见达赖喇嘛的过程中，有句话一直在我嘴边没说出口——如果采用递进民主制，即使西藏独立的目标都可以实现。那只要具备一个前提——绝大多数西藏人都坚决要求独立。我没讲这句话，是因为感觉似乎真有点“叛国”味道了。不过平心而论，我跟达赖喇嘛讲的一切，目的都在于把西藏留在中国，而不是要让西藏独立。我为达赖喇嘛所做的任何“出谋划策”，也都是以“西藏留在中国”为我们的共同基础。只不过我认为能够使西藏最终留在中国的，不是镇压，而是给西藏自由与自主。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如果中国方面能主动允许西藏实行递进民主制，西藏独立的前提就不会存在。因为实行了递进民主制的西藏已经实现高度自治，绝大多数西藏人就不会再去要求独立。而且递进民主制产生的西藏领导人将是有高度理性的，他们比谁都清楚追求独立要付出的代价是西藏无法承受的。关于这方面的论证，我已写在《递进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比较》一文中。

想到这里，我闪念了一下，如果回国后主动要求“汇报”这次见达赖喇嘛的情况，能不能引起高层重视，从而借这种“汇报”把以递进民主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传递给他们呢？会不会对解决西藏问题起到推动，也对递进民主制的启动有帮助呢？然而立刻被我否定了。对一个连村级选举都百般限制的政权，如何可以想象它能尝试另一种完全异类的政治制度呢？

不过与达赖喇嘛谈了这么多，总该找出一些可以沟通的内容，产生一些作用吧？总结下来，可以谈的有三点：一是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的诚意，可以用我的近距离观察，反驳把“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二是达赖喇嘛的健康状况，让那些认定他已身心日衰，力图把西藏问题拖到他死后的人重新考虑一下时间表；三是达赖喇嘛在西方社会的威望，把这样的人放在敌对位置，等于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在阐明这三点的基础上，再谈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只有同达赖喇嘛达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对中国才是一劳永逸。这样去谈，能不能对决策者产生一点影响呢？

然而一考虑如何去谈的细节，难题就出来了。首先跟谁去谈？那不能是安全部门，我不想与其合作，也不想自找麻烦；那么就只剩下一个部门管这事——统战部。但提起这个部门就让人泄气，多年来它对解决西藏问题只是障碍，没起过好作用。一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还和统战部主管西藏事务的官员有过辩论，深知那些人不会接受任何承认达赖喇嘛作用的想法。国际上所说的“中国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到底不过是中共政治局数个常委对西藏问题的态度。那几个人管理如此大的中国，西藏问题平时很难进入脑海，也不可能深入思考，因此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思路，国际方面只能被统战部主导，国内方面则是被藏区地方政府主导。而确定与达赖为敌到底的方针，统战部起了主要作用，倘若要它就此改变，等于否定了它以前的所说和所做。在专制体制内，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找统战部谈这种话题，纯属自找没趣。

最后我只能倍觉无奈，放弃所有想法。在朦胧入睡前，临别时回首看见的达赖喇嘛不断浮现在眼前。他那披着绛红袈裟的沉默身影让我如此难忘，是因为让我想起一部纪录片中深深感动过我的镜头，那是一位流亡异乡已经几十年的老喇嘛，孤独地站在边境线上尼泊尔一侧的山顶，遥望西藏的广阔高原不可遏止地痛哭……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 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小说提纲

达赖喇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始终没有实现回到西藏的愿望。中共仍然牢牢控制西藏，藏人尽管不满，却没有能力反抗。

令达赖喇嘛感到安慰的是噶玛巴已经成长起来，可以承担西藏的政教大业了。当年他一听到噶玛巴逃亡到印度，就意识到是诸佛菩萨的又一次显灵，赐予西藏一个无价珍宝。

他很早就担忧，在他离世后西藏事业会不会因为群龙无首而分崩离析？转世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每代达赖至少成长二十年，才能真正承担政教大业。这个空白在平静年代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在历史关头就会有致命影响。这一担忧搅得他昼夜不安，甚至想过要把下世达赖改为由自己指定，或者由僧侣长老选举，以便直接产生成熟的下一世达赖，避免空白。不过他也清楚，这种改革既无法说服他的左右，也无法保证新达赖在信徒心中的合法性。

传统是不能轻易破坏的，因为西藏和藏传佛教全靠传统维系着。

噶玛巴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难题。噶玛巴虽然不是达赖，但在新达赖长大以前，班禅被中共封锁之时，作为西藏宗教最重要的法王，他的地位无人可比，以他来做藏民族的精神领袖和凝聚传统的核心，顺理成章。噶玛巴属于噶举派，这无关紧要，就象达赖属于格鲁派并不妨碍所有藏人崇拜一样。中共原打算扶持噶玛巴对抗达赖，本是噶举派大举发展的良机，噶玛巴却毅然出走，足以证明他以整个藏传佛教为重，而不图教派利益，这使他在所有教派的藏人中获得极高威信，众望所归。

多年来，达赖喇嘛在噶玛巴身上倾注了无数心血，他把自己的思想点点滴滴又巨细无遗地传给少年法王，那过程就象把他自己的灵魂逐步转移进一个年轻躯体，在这世界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化身。他俩相差五十岁，彼此建立了父子情深般的相知相投，至今可以说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他完全可以放心，即使他离开人世，噶玛巴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也会如同出自他本身一样。

多年来，他处心积虑的培养和有意识的树立，使噶玛巴具备了充当西藏政治领袖和民族代表的无二地位。噶玛巴一成年，达赖喇嘛就自觉地逐步淡出，把越来越多的事务交给噶玛巴独立处理，让年轻的噶玛巴站到前台。在锻炼噶玛巴的政治能力的同时，一方面让他在国际社会建立个人关系，一方面使他得以常在传媒的聚光灯下现身。如今，噶玛巴已经是具有世界性声誉的杰出政治家，也已经成为海外西藏运动无可争议的核心。

达赖喇嘛就要离开人世了，北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达赖喇嘛非常清楚，只要他一死，北京立刻就会自己确立一个转世达赖。内线情报说北京早在几年前就秘密成立了“达赖灵童寻访小组”，一直在做准备，以便达赖一死就以最快速度推出达赖转世。即便他们立的达赖大部分藏人不会承认，然而他们的目的并非宗教，他们才不会去珍惜宗教的纯洁神圣。只要能让藏人陷入思维迷乱和精神分裂，目的就算达到。活佛转世正是这样一个手段，从班禅转世开始，至今西藏的每一个重要活佛都出现两个转世，一个是达赖方面认定的，另一个是中共方面推出的。这对西藏宗教是一种致命的破坏。中共选定的“转世”虽然在宗教上难以立住，但他们的优势是可以在西藏本土活动，占据着寺庙，直接面对百姓；而达赖认定的活佛，要么被控制，不知去向，要么流亡国外，都与百姓相隔绝。西藏宗教最神圣的转世制度这样被糟蹋下去，将是西藏宗教和文化的灭顶之灾。

现在，达赖喇嘛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转世之途，作为西藏宗教的领袖，他该怎么在最后关头把西藏从这已经可以看见的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呢？他已经贡献了一生，竭尽所有，凡是与他生命有关的，已经再无剩余，他现在拥有的，只有他所面临的死亡。

他只能使用自己的死亡了。

多年前达赖喇嘛就对外界做过宣布——如果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能回到西藏，那么他的转世也必定不会在西藏。他做这个宣布的时候，心里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北京谈判的希望，但也是在进行铺垫——如果北京始终不跟他谈，或是最终没谈出结果，他这种宣布就意味北京所找的达赖转世必定是假，是作为前世达赖的他所不承认的。

仅仅宣布北京找的达赖是假的还不够，北京并不在乎，也不会阻止它做假做到底，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真，而就是要以假乱真，制造迷乱，这种时候，最好的防守只能是发起进攻。

在弥留之际，达赖喇嘛当着所有宗教长老的面，让噶玛巴活佛宣读了他对自己转世的预言和指示。非常简单，只说明他将投生到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以便把佛法弘扬到整个世界和人类。

佛教本无种族国界的概念，达赖的转世不在西藏，不是藏人，理论上是不构成障碍的，反而还体现佛教的博大、佛之全能及达赖喇嘛作为整个人类的领袖。宗教长老们对达赖喇嘛的指示没有异议。

当天晚上，达赖喇嘛圆寂。一直陪伴在达赖身边的噶玛巴提醒人们注意，达赖喇嘛圆寂的姿势摆出了一个特殊手势，指向桌上的地球仪。从他的食指尖向地球仪延伸，落点是地球仪上的美国洛杉矶。这意味什么，大家立刻明白——达赖喇嘛的转世去了那里。

有如此明确的指示，噶玛巴派出的寻访者在得以最短时间就认定了灵童——那是达赖喇嘛圆寂后几小时在洛杉矶出生的一个美国婴儿。

那婴儿的母亲曾是世界最走红的歌星，在各国拥有数以亿计的歌迷。她早年就皈依了藏传佛教，正当事业达到颠峰时刻，却突然宣布放弃演艺前途，一心钻研佛法和修行。不过她始终还保持着世界性影响。在她刚出生的孩子被认定为达赖转世灵童消息传出后，全世界为之爆炸，几百名记者把她的住宅包围得水泄不通，全球二十亿观众在电视上跟踪这个新闻。如此的轰动效应在人类新闻史上从未有过前例。

目瞪口呆的北京政府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刻开动一切宣传机器进行反击，抨击那是一个背叛宗教出卖中国的阴谋，是十四世达赖与噶玛巴共同制造的一个骗局。北京不惜牺牲了多年卧底在达赖身边的特工，用他传回的情报向世界作证：那位歌星此前一直与达赖保持单线联系，数度化名化装到达兰萨拉与达赖和噶玛巴秘密见面。她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进行这场转世骗局。北京公布的细节还包括歌星怀孕后提前对胎儿做过检查，达赖对胎儿是男孩的检查结果非常欣慰。当达赖得知歌星临产住进医院的消息时，握住噶玛巴的手说他到了该走时刻，并预言佛教将在全世界长存光大。噶玛巴则跪在他身边流泪不起。北京从这些细节断言，达赖肯定是“自闭心门”而死，为的是避免他死在歌星的男婴出生之后，使其转世骗局不能自圆其说。

北京同时对歌星的家族背景提出质疑：歌星之父是全球排名第七十七的富豪，财可抵国；歌星个人家产也有上亿；而她哥哥则是美国新生代的政治明星，不到四十岁就当选了加州州长，被公认是未来美国总统的问鼎者。难道清心寡欲的佛也有如此的势利眼？偏偏要投胎这种家庭？除了为的是世俗目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北京的抨击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中国人普遍认为这只是美国肢解中国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达赖不过是其中一个走卒而已。

然而在国际社会，北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几乎无人理睬。整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欣喜若狂，人们沉浸在这一东西方融合的大童话中，宁愿只相信其中的浪漫和传奇，拒绝任何世俗的沾染。这也是因为以往北京给世界留下的说谎印象，即便它所说有真实成分，也成了“假做真来真亦假”。

噶玛巴一方对转世的迅速认定，打乱了原本志在先得的北京的阵脚。由中共选择达赖本来就没有合法性，如果它能抢个先机，还可以引起一些注意，至少夺走一些风头。然而落在后面，再找灵童就成为东施效颦的闹剧，徒然惹人讥笑和反感。

达赖转世到美国，使得藏传佛教更加风靡西方。在此之前，佛教已经以超过其他宗教的速度在西方发展，现在则更是归者如云。信仰藏传佛教成了社会时尚，其信徒数量直逼基督教和天主教，成为西方各国政治家都必须讨好的社会群体。

歌星的父亲——也就是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外公——斥巨资在内华达山脉深处开始修建一座最终要与布达拉宫比美的喇嘛寺。噶玛巴派去的一个庞大西藏僧侣团对其进行指导并主持寺庙活动。金发碧眼的十五世达赖在最先落成的大经堂举行了坐床仪式，今后也将以那里为根本驻锡地。西藏僧侣团将会一直陪伴他左右，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对他进行严格培养。

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成了西方世界万众欢腾的盛事。美国总统和西方多位元首亲临参加。各国外交部面对中国政府的愤怒谴责，回答口径出奇地一致——元首们参加的是一位美国公民的宗教活动，与中国事务无关。

北京一方面声称达赖的产生需要通过中央政府的“金瓶掣签”；一方面从两个角度否定“白达赖”。一是传统角度，坚称达赖灵童的认定必须通过班禅，而目前居住北京的班禅不承认这个“白达赖”；二是种族角度，咬住达赖喇嘛不可能不是藏人，藏传佛教也不可能不在西藏。然而对所谓的“金瓶掣签”，藏人在历史上就不承认，现在更不会理睬。至于说达赖和班禅需要相互认定对方的转世倒是没错，但却使它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当年正是北京首先废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灵童，另立了一个班禅，现在它推出来的班禅就是没有经过达赖认定的，又有什么资格去认定达赖呢？反而人们却要求北京交出当年由十四世达赖认定的班禅，因为只有那个班禅才有资格对达赖的转世发言。而对北京所宣称的种族问题，噶玛巴则以一句玩笑来驳斥：马克思主义可以“工人无祖国”，佛教为什么不可以呢？宗教本是最没有种族之分的。你们共产党怎么从国际主义者蜕变成了种族主义分子？

在噶玛巴的玩笑后面，的确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深谋远虑。他转世到美国，绝非仅仅是一个为了现世政治的计谋，也同时是一种光大佛教的长远安排。如果把藏传佛教囿于西藏本土，结果就是被共产党的统治窒息，只有让它走向世界，与现代人类的主流结合，才能找到新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藏传佛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也许正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新生。

但是中国国内却由此掀起了新一波反美反西方的浪潮。中共多年以民族主义替代已经成为空壳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以片面信息和虚假信息进行诱导，有效地把社会不满凝结到了仇视西方的出口上。达赖转世的争执无异给中国人原本就躁动不安的情绪火上浇油，一些大城市陆续开始发生反美事件。

北京坚持一贯的“不听邪”姿态，自行在四川藏区的德格寻访出一汉化藏人家庭的孩子，宣布他为达赖转世灵童。为了抵消“白达赖”在世界以及在西藏造成的影响，北京决定为它的灵童在拉萨举行一场空前盛大的坐床典礼。典礼由藏人所称的“汉班禅”主持。北京的这一宣布立刻遭到全世界民众、媒体、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广泛批评，并通过广播、互联网和地下渠道广泛传入西藏，进一步刺激了不安的藏人。

在拉萨举行的坐床典礼成了藏人起事的一个号令。首先是各寺庙的僧侣集体罢工，使典礼法会无法举行。面对各国媒体的摄象机尴尬不已的拉萨当局急于让僧侣们听话，在采取措施的过程中引发了冲突，很快就星火燎原般地扩展，变成了拉萨街头的骚乱和持续抗议。随之骚乱扩展到西藏各地。在当局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始演化成暴动。

第一批牺牲者是一些进藏施工做生意的汉人，他们被暴动者残酷地杀死，尸体拖在马后。随着仇杀蔓延，在藏汉人纷纷逃回内地。为了恢复秩序，军警实行开枪镇压。藏人被杀的传言满天乱飞，谁也搞不清准确数字，却更加激起藏人的仇恨与反抗。中国的空降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奉命开进西藏，却无法阻止暴动滚雪球式地不断扩展。青海、四川的藏区也被卷入。海外流亡藏人则成批潜回西藏本土参加他们所称的“西藏解放圣战”。汉藏接合地区相继发生不断升级的汉藏民族冲突。藏民游击队在广阔的青藏高原神出鬼没，进行围剿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往往徒劳无功。日益焦躁的镇压者采取了越来越严酷的血腥手段。

通过各种渠道传出的藏人遭受屠杀的消息使西方民众愤怒，其中尤属美国人最激烈。似乎全体美国人的血脉已经通过“白达赖”与西藏联系在了一起，藏人流的血就是他们的血。几乎每个西方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联合国和本国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国对藏人的野蛮行为。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怒不可遏，深感西方欺人太甚。各大城市开始还是在政府控制下进行有组织的抗议，很快就脱离了政府安排的轨道，演变为各种矛盾同时释放的爆发，并越来越带有暴力性质，矛头直指所有西方机构和西方人，恶性事件接连发生。被吓坏了的西方人纷纷逃离中国，外国资本也从中国大批撤出。

沦落底层的中国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开始清算一切与外国资本有关联的官员和企业家，把他们视为卖国贼。清算风潮很快波及到所有富人，他们的财产一概被视为不是出卖民族利益就是腐败所得。“造反有理”与“剥夺剥夺者” 的口号重新开始流行。打砸抢在整个社会蔓延。对自己培育的魔鬼，中国政府越来越感到失去控制。

而这时，早就在等待摧毁中共政权的美国抓住时机介入。表面上它只是应噶玛巴的呼吁，联合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取消定单、停止出口、拒绝贷款、禁止投资……实际上却是它把多年撒下的大网开始收口。

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美国与西方就一直没有停止把中国拉进“全球化陷阱”的努力，至今已经成功地把中国置于了陷阱之中。今天的中国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所谓“国际大循环”支撑，“两头在外”。而西方世界对中国一关门，“循环”的链条立刻中断，就变成“两头”皆无。这种影响在瞬时间就会扩散到方方面面。首先是大批工厂停工倒闭，失业剧增，流民汹涌；然后是各级政府财政枯竭，物价飞涨，储户挤兑，靠外资输血的银行纷纷倒闭；最后是国家信用崩溃，发生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积重难返而全靠强权镇压的社会矛盾同时爆发……

中国内地发生的经济崩溃，对中国驻藏军队产生了致命影响。现代军队全靠后勤保障，西藏当地没有后勤资源，只能从中国内地输送。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破坏了内地的供应体系，后勤一断，驻藏军队立刻就失去机动作战能力，陷入瘫痪，只能缩在军营里自保。西藏起义随之愈加扩大。各级政府纷纷垮台，被代之以起义藏人的临时政权。当联合国最终在西方国家压力下向西藏派出“和平部队”的时候，西藏相当一部分部分地盘已经被起义藏人控制。

面临社会失控的严峻形势，北京不得不决定向西方让步。虽然民族主义呼声仍然强烈，但身处执政集团之内的人都明白，此刻最重要的危险已经不是失去西藏，而是整个中国的崩溃。能否制止中国崩溃，取决于能否在最短时间制止经济危机，而制止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就是西方解除制裁。因此，以西藏换取西方解除制裁不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别无它途的唯一选择。

然而，当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按照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五点原则”解决西藏问题时，作为西藏人领袖的噶玛巴却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毅然抛弃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代之以西藏彻底独立的要求。他历数西藏在中国统治下遭受的苦难，说明中国的退让只能是一时，稍有转圜就会旧戏重演。他的例证之一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几十年的和平主张没有换来中国丝毫让步，西藏怎么能相信未来的中国就会遵守诺言？因此只有彻底独立才可以使西藏永远摆脱中国的迫害！

西方民众对此完全相信，纷纷敦促自己的政府支持西藏独立。美国加州州长——“白达赖”的舅舅也在美国政治高层积极推动。而分解中国正好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一致。噶玛巴的主张因此首先被美国政府认可。有美国带头，对中国政府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在本国社会动荡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迫之下，北京最终不得不在同意西藏独立的协议上签字。

金秋，西藏独立日，拉萨万人空巷，欢迎噶玛巴重返拉萨。整个拉萨已看不到汉人踪影，他们全部被赶出西藏。而藏人从草原、农村和各个城镇涌来拉萨，在城外扎起了如同古代军营般的帐篷城，一同欢庆这个盛大的节日。搀杂在藏人中间的是形形色色的西方人，他们终于可以不受阻碍，自由地访问心仪已久的雪域圣地了。

噶玛巴立于敞篷轿车驶进拉萨，前面马队开道，身后是望不到头的车队。路两侧到处是经幡彩旗，煨桑烟火缭绕，海螺法号长鸣，人们载歌载舞。西方人手中都举着“白达赖”画像。有了十五世达赖这个纽带，西藏从此与西方世界紧密结为一体，即使有一天中国能重新稳定，面对西藏背后的西方，也不敢再对西藏下手。何况，噶玛巴知道，美国已经打定主意要肢解中国。此时此刻，新疆和内蒙都在步西藏的后尘，走上争取独立之路。国际社会将继续逼中国让步。中国注定衰落，不再成为世界和西藏的威胁。

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五世达赖喇嘛的巨幅画像并排挂在布达拉宫，衬映着金顶和蓝天。噶玛巴看着那一老一小、一藏一西两个形象，内心又一次深深感叹转世的奇妙——仅仅这样使用一次转世，就得以挽救西藏，使西藏在劫难中重生，并使佛教之光普照到整个人类。

虽然十四世达赖喇嘛生前没能回西藏，却借他的转世，使全体西藏人重获自己的家园。噶玛巴确信无疑，等到下一次转世，达赖喇嘛一定会重新降生回这片雪域高原，回到他所衷情的西藏和他所热爱的人民中间。

另一个小说的片段

“J”领来的汉人没有常人见到达赖时那种惟恐不周的礼节，在他的握手和直视中，达赖喇嘛感受的是一种平等与直截了当的诚恳，这是一个好的“第一印象”。刚听到这位汉人求见时，达赖喇嘛还有点犹豫，但这汉人是“J”带来的，必然事关重大。“J”是流亡政府安插在北京高层的密线，只有最紧要关头才会动用。这回突然自行飞来达兰萨拉，不惜暴露身份，带来这样一个汉人，没有天大的事情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想得再大，达赖喇嘛也没想到事情会大到这种程度——这位汉人是作为中国几方面政治势力的共同代表，来请他前往风雨飘摇即将分崩离析的中国，不是去观光，不是去做客，也不是去谈判久拖不决的西藏问题，而是去担当中国——是整个中国——的国家元首！

汉人直率地承认这请求当然不是出于道德，也不是为达赖喇嘛，甚至也不是为西藏，而是为中国——当然，在为中国的同时，为西藏也就在其中了。他这样说明中国为什么需要达赖喇嘛去当国家元首：

第一，专制统治在中国已维持不下去，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正在集中爆发，社会濒临失控的边缘，不马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型，全面崩溃就在眼前——这一点已被中国目前各方力量认同。社会转型因此被提了上最迫切的日程；

第二，原本的专制权力为自身地位不受威胁，长期以来铲除和窒息了所有可能整合中国的力量与领袖人物，而那种力量和领袖人物即使现在给他们生长的空间，相当时间内也不可能形成和出现，对目前中国，既没有时间去等待他们生长，也不可能在没有整合力量与领袖的“真空”下进行社会转型——那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控局面。因此，首先找到一个可以整合中国的力量，推举一个能够领导中国社会转型的领袖，就成了此时中国的当务之急；

第三，这样一个领袖既要能被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都接受，同时也必须被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所认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能够安全而顺利地实现，西方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支持至关重要。

对此，只有达赖喇嘛符合这样的条件。他的国际威望、与西方的关系自不用说，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望其项背；即使是对中国国内力量，也只有达赖喇嘛可以被各方所接受。例如民主派理念虽然不错，但自身缺乏道德资源，对外没有足够威信，内部也是山头林立，无人可以服众，达赖喇嘛的民主形象和社会威望，却能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所接受；

再如大陆转型能否同时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这也是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考虑的问题。台湾一直表示只要大陆民主化就可以谈统一，但是具体实施，必定存在一个谁为主导的问题。无论是大陆和台湾，统一进程以哪边为主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抵触与不信任。这就需要一个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不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对此，达赖喇嘛显然最为合适；

还有更重大的少数民族问题。从极权向民主转型，最容易发生民族分裂。这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障碍。因为民主化并不只是汉人的民主，少数民族也要有民主，如果少数民族行使民主的结果就是要独立，要脱离中国，怎么办？用飞机坦克去镇压——那就回到了没有民主。这成了一个怪圈。虽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许诺民族和睦，可是少数民族能不能信？他们上当受骗的次数已经太多了。因此，解决这个至关重大的问题，达赖喇嘛担任中国国家元首可以作为一把钥匙。一方面最大地表示了汉人对解决民族矛盾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除少数民族的疑惧，树立他们的信心。西藏问题不用说，自然用不着再搞独立，新疆、内蒙也会随西藏而稳定下来。只有在这种保证国家完整的前提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并达到各方的同时多赢。

达赖喇嘛一直静静听着，这时微笑地插话：“你没有说到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会怎么想。共产党宣传了这么多年我是个分裂分子，他们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坏家伙’当元首？”

汉人有备而来，他当然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因此才留在后面专门谈：

的确，除了为数不多的自由知识分子，汉族精英阶层和目前仍然掌握权力的各级官员，是在感情上对达赖喇嘛最为排斥的一个群体。且不说多年的官方宣传造成了怎样的扭曲，至少他们心目中没有树立起达赖喇嘛的威望。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同意达赖喇嘛来坐中国的最高交椅呢？

汉人说，考虑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改变，不再是感情至上或意识形态至上。邓小平“抓住老鼠即好猫”的哲学早已经把中共从一个信仰集团转成一个利益集团，而这种实用主义也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依据。一切原则都不重要，判断问题只看利害，这使得他们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必要时可以毫不困难地一百八十度转弯。对精英集团，他们能接受达赖喇嘛来自这样一个共识——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垮的结果将是玉石俱焚，大家同归于尽，谁也不可能从中单独地捞到好处。正是这一共识能使他们抛开成见，只要有人可以让中国避免那个可怕前景，无论那人是谁他们都会接受。何况他们也能认识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在国际威望和道德形象上可以成为合格的领袖，请一个“远道和尚”来念经，至少还可以避免彼此的倾轧和内斗。达赖喇嘛不正是这样一个 “远道和尚”吗？他是名副其实的和尚，而且住在遥远的印度。

中国人能接受达赖喇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只有达赖喇嘛能为此时的中国提供最大好处。中国经济的命脉现在完全掐在西方手里，西方帮不帮中国，使多大的劲，肯出多少血，对中国绝对性命攸关。中国目前没有任何人与西方有过硬关系，达赖喇嘛却在西方光芒四射，拥有无数信徒、崇拜者以及政治经济界的高层关系，由他当中国国家元首，领导中国社会转型，无疑能够获得西方的最大信任和支持，也因此能为中国从西方得到最多的资源——这正是当前中国尤其需要的。从这个角度，达赖喇嘛能捉到“老鼠”，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个好猫。

至于老百姓，他们总是被精英主导的。没有精英的煽动和组织，他们自己一般不会闹什么事，也闹不起来。如果精英再向他们说明为什么应该请达赖喇当国家元首，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政治狂热和民族激情本质上都不是老百姓所具有和所需要的，他们要的只是自己个人与家庭生活的美好。中国民众早就被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有谁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与幸福的希望，就算那人来自外星，是个ET，他们也会拥护。

汉人每说完一段，就端起酥油茶在嘴边抿一下，但只是个热爱藏族风俗的象征动作，然后放下茶杯接着讲。他的思路显然已经演习了多遍。

汉人开始陈述作为国家元首的达赖喇嘛做什么工作：首先可以放心，元首职务并不影响他的宗教活动，仍然可以做他身为活佛该做的一切，但是相信达赖喇嘛不会把政治和宗教搞到一起，这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规则，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多次表达过的愿望。

（谁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话说在前面的委婉提醒）

目前将要组成的政权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协商的结果，因为是在原本的极权制度框架下形成，还没有民意参与，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因此只能是一个转型期的过渡政权，达赖喇嘛担当的因此也只是一个“临时元首”。这个过渡政权的使命是带领中国社会顺利地完成转型，并保证转型期间不发生社会失控。过渡政权首先要自上而下地为中国奠定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基础，再从那基础开始，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民意表达的结构，包括确立各民族之间关系，形成相应立法等。待这个过程完成，民意结构得到确立并可以开始自行运转时，社会转型即告完成，过渡政权也就随之终结。那时，达赖喇嘛就可以回到西藏，专心去从事宗教活动了。

过渡政权的最高机构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力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大政方针由这个委员会决定，具体实施则由委员会选定的内阁进行。因此，并无太多日常事务烦扰达赖喇嘛，要他做的事情只有两种，一是当委员会遇到僵持不下的问题时，由他做最后裁决；另一种就是处理国际关系……

“不如直说就是让达赖喇嘛为你们向世界去要钱！”坐在一边的晋美噶伦终于忍无可忍。“达赖喇嘛如果能要钱，为什么不给西藏要，去给你们中国要？你们中国会怎么样，能不能转型，跟我们西藏有什么关系？达赖喇嘛为什么要管？这么多年达赖喇嘛怎么呼吁，你们就是不理。现在没路走了，才想起达赖喇嘛，还不是要把他当成你们的工具！”

晋美噶伦的话既是说给汉人听的，也是说给达赖喇嘛听的。这一段时间，面对中国即将分崩离析，流亡藏人普遍欢欣鼓舞。多年盼望的时机终于就在眼前，西藏要抓住这个时机实现独立，跟中国一刀两断。他们敦促达赖喇嘛下这个决心。

对是否把达赖喇嘛当成工具，汉人并不争辩。他只针对中国和西藏有没有关系表达看法。他说，如果中国社会一转型，西藏就要独立，那就等于给了专制势力拒绝转型的最好口实。中国和苏联不一样，不可能以解体模式实现转型，苏联解体，百分之五十几的俄罗斯人分到百分之七十几的领土，障碍不大，而西藏、新疆和内蒙加起来超过中国领土一半以上，中国解体，百分之九十几的汉人只剩百分之四十几的面积，怎么能接受？而没有多数民族的同意，一个国家不可能和平解体，那就免不了战争。对此，西藏有把握在战争中打赢吗？

即使中国落进内乱，一时顾不过来，西藏得以象“辛亥革命”期间那样一时摆脱中国，但是只要中国稍一安定，肯定就会重新去“经营西藏”。过去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不管西藏人怎么看，十几亿汉人现在已经把西藏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谁上台都不能不在乎这种“民意”。一旦受到丧失西藏的刺激，民众甚至可能把叫嚣战争的法西斯势力推选上台。那样的结果就不仅是西藏人民的灾难了，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对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也是重大挫折。

以为西藏可以和中国没关系，完全是一相情愿。现实生活不是头脑里的想象，你想没关系，可是汉藏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开的一条线。西藏对汉人早不是畏途，道路畅通，飞机穿越，半个多世纪无数人来人往。你能挡住千万汉人自由的脚吗？除非是西藏能建起一道几千公里长的铜墙铁壁。你有那个能力吗？藏族一共六百万人，难道要让全部成年男人都去守边防？还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汉藏混居区怎么办？你是撤走那里的藏人，还是驱赶掉那里的汉人？只要做不到彻底的民族隔离，就永远切不断汉藏双方的联系……

达赖喇嘛听着两人争论，虽然晋美是他信赖的心腹，但是他心里知道汉人的话更对。西藏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自以为可以封闭在雪山深处与世无关的愚蠢。正是因为那种愚蠢，西藏才遭受后来的厄运。在全球一体化的今日，任何闭关自守的想法都是虚幻，注定自取灭亡。西藏必须把自己放到世界范围去审视处境，才可能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正确之路。

汉人如同一个预言者那样发出告诫：即使退一万步，你们真能做到把汉人堵在西藏之外，比如靠西方的钱、靠印度的人，结果也将是制造一个既是中国也是世界最终也不可不不降临到西藏的灾难。西藏独立必然带动新疆分离，那里汉人居民多，势均力敌，民族仇杀包括种族清洗肯定异常残酷，难免不导致中亚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卷入；内蒙也不会太平，那里牵扯到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蒙古，因此会把俄国也拉进来。现在的中国就象一个装满散沙的玻璃器皿，稍强一点的震动就可能使玻璃器皿粉碎，散沙就铺天盖地撒向四方。在数亿人潮的冲击下，国际秩序和经济体系将无法维持，西方那时不可能再继续支持西藏，西藏也就立刻无法再维持与汉人接壤的几千公里边防。而那时，中国难民将同样涌入西藏，不用多，进去一千万，你们就没了！

说到这，汉人直视达赖喇嘛，声音中带着发自肺腑的恳求：“达赖喇嘛，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化身，你来到人间，是为传播普度众生的大乘精神，难道你能看着世界陷入灾难不管吗？人类前途系于你一身，你答应出来领导中国，中国就不会乱，就能顺利实现转型，那既是十三亿中国人的幸福，也等于为世界消除了一个最大祸根。世界将由此而得救，西藏将由此而平安。你会因此再获诺贝尔和平奖，你的纪念碑将永远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永垂青史，光照人寰。除此而外，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因为得到拯救而皈依你的足下，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达赖喇嘛，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就拜你为上师。”说罢，汉人起身欲拜。

达赖喇嘛阻止了他，并幽默地问他，汉人是不是都这样“临时抱佛脚”。汉人的确是个功利化的民族，对宗教一向图的就是现世回报。不过达赖喇嘛并不这样想眼前这个汉人。他不过是在演戏，在要将自己的军而已。

达赖喇嘛暂时不会正面回答汉人的请求。俗世那些得奖、立碑丝毫不能打动他，佛何尝需要“功”与“绩”，然而的确，佛却有“慈”和“悲”，如果能免除十三亿人（尽管是中国人）落入苦海，如果能拯救全世界脱离危难，难道不正是生而为佛的他来到人间的意义吗？他已经无所作为地等待了一生，会不会为的就是在这最后关头，让那全部的意义喷薄而发呢？

2000年1月 北京

# 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王力雄·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 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达赖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达赖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30]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达赖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 西藏面对的两种帝国主义——透视唯色事件

政治帝国主义的文化压制

由于帝国主义的坏名声和文明社会对其的否定，简单的领土扩张和财富掠夺已非当今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即使仍然保持着占领和殖民，也要披上有利于当地民族的外衣，包括进行经济援助，以文明上的优越姿态和物质上的恩赐者自居。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目前关于西藏问题的争论，文化是一个焦点。针对外界批评，中国政府列举诸多实例说明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维修寺庙、保护文物、推行藏文教育、规定使用双语、挽救失传艺术等。而国际社会与西藏流亡者在这些方面指责中国，同样可以举出很多实例。双方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在我看来，从这个角度争论文化是一种偏离。因为民族文化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的自我表述。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复述历史和表演传统，更重要的是对本民族现实处境的感受、思考和诉求。既便是对历史与传统的表述，也只有发自民族本体，并与民族现实意识结合在一起，才是活的文化。否则失去民族的自我，割断了与现实的联系，文化就成为空壳和傀儡，徒具形式而不再具有生命。

举例说，即使把民族文字保留得再好，但是不允许用民族文字诉说民族的真实感受，只能复述帝国统治者的声音，那种文字还有多少真实的文化意义？因此判断民族文化是否得到保护，主要的衡量不是对传统的保留，更不是投资数量的多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局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和压制就变得清晰——不管它做了多少其他事情，它恰恰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就是一个例证。

唯色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1966年生于拉萨，在四川藏区长大，1988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当过甘孜州报记者，1990年调拉萨任《西藏文学》杂志编辑，个人著作有《西藏在上》、《绛红色的地图》、《西藏笔记》等。给唯色惹来麻烦的是《西藏笔记》一书。

《西藏笔记》是唯色的一本散文集，2003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一方面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了当局注意。首先是中共统战部认为该书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西藏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随即要求就《西藏笔记》一书进行审查，同时禁止在西藏销售《西藏笔记》一书，随后又要求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全面查禁《西藏笔记》。

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湎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继而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2004年2月23日，见中国发行英才网《图书出版通讯》总第22期）。

上述对《西藏笔记》一书的指责，全盘是用帝国意识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识。把“崇信和宣扬宗教”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唯色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赞美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噶玛巴本是天经地义，只有殖民者才会因为民族压迫的需要将其列为罪状；而因为没有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沉缅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就是“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则充满了帝国主义的霸道与强词夺理。

《西藏笔记》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得以出版某种程度上可算奇迹。也许因为广东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商业化环境，成为相对宽松自由之地，才使《西藏笔记》能够面世。其中被新闻出版总署点名的《尼玛次仁》一文，深刻地表达出了被压迫民族的压抑和无奈。从一位维吾尔族读者用不准确的汉语写给唯色的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出所引起的共鸣：

我正在看您的书，尼玛次仁在挪威的时候小姑娘跟他说完话以后我很难受，难以控制自己自然的很很的哭了一囤。反复念了几回。谁知道他回答姑娘的提问哪一段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大声的哭开了，我一个人哭了很长时间。好象有个东西很很的挤我的心，我这个微弱心脏难以承受。我很想大声的喊……可惜我没有哪个勇气，我比尼玛次仁可怜的多。

《西藏笔记》被封杀时，唯色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参加期刊主编高级研讨班，西藏文联此前考虑让她担任《西藏文学》副主编。但事情一出，西藏方面马上中止她的学习，将她召回拉萨，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她进行“思想教育”，要求她“检讨”和“过关”。

上面引号中的词是中共的专用词汇。那是一整套精神控制的方法和手段，被形象地称作“整人”。其核心在于迫使人在强权面前屈膝，放弃独立与尊严，经过不断反复和记录在案的自我否定，在充分满足中共的要求后，再被批准“重新做人”，从此不敢越轨，还要感恩戴德。这套手法中共用了几十年，已经化作其各级组织的本能，一有需要就会自动启动。

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屈服，以求过关，这在中国已是多年通行的方式，人们也久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文化，并不为耻。唯色如果这样做，固然不可能再提升主编，还可能下放农村改造思想，但至少可以保住每月工资。这在体制外空间相当狭窄的西藏是非常被人看重的。用藏族语言形容，有工资就像家里养了奶牛，每天都有奶喝。

但唯色不能那样“过关”，因为她首先过不了自己的信仰关。既然她被指责“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就只有反过来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才可能“过关”，至少也得重复当年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所说——“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可唯色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宗教领袖说出这种话呢？说达赖喇嘛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难道不是颠倒黑白？她不能这样说，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良心。在佛教中，攻击上师是重大的罪孽；而究竟是谁赶走了达赖，屠杀了几十万藏人，毁灭了西藏所有寺庙呢？他们才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罪魁祸首呀。

西藏前中共书记陈奎元“整顿寺庙”的时候，曾要求每一个西藏僧侣都得亲笔写下李瑞环对达赖的定性，谁不写就会被驱离寺庙。不过藏文中的“是”和“不是”只差一个点，一些僧人用难以察觉的笔触在那四个“是”上加一点，以求既能过关，又不攻击上师。然而唯色是无法这样做的，她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汉语中的“不是”并非多一个点，而是多一个字，没有蒙混过关的可能。

面对当局每天的车轮战——各种角色轮流找她和她的家人“做思想工作”（实质是一种对人精神的虐待和摧毁），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整日骚扰使她不堪重负，这时又指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接受教育”，而她一直对修建青藏铁路持反对态度。她知道自己缺乏和那个体系对抗与周旋下去的力量，于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西藏。

走前她给西藏文联最高决策核心——中共党组留下一封信，题为《我永远是一个信仰佛教的西藏作家》。全文如下：

文联党组：

对《西藏笔记》的指责，主要集中于对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看法。要我“过关”，则是要我承认信仰佛教是错误，承认我以自己眼光观察西藏现实不应该，必须在未来的写作中放弃宗教，以及对西藏现实的描述必须遵照官方口径，等等。对此我只能表示，这个“关”我过不了，也不愿过。而且在我看，这种“过关”有悖作家的天职和良心。

目前，留在拉萨接受我不会接受的“教育”，既不会有结果，也给大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文联亦难以交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我暂时离开拉萨，在外地等候有关部门的最后处理。我愿意为我所做的选择承担一切后果。

 唯 色

 2003-9-14

到目前为止，唯色已经得到了如下惩罚：1、以“自动离职”的名义剥夺工作职位，使她丧失收入；2、没收住房，她目前只能在母亲家栖身；3、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使她失去全部社会保障；4、不批准她办理出国护照。可以说，除了关进监狱，能被剥夺的都剥夺了。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文化帝国主义的惟我独尊

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说政治的帝国有一天可能分崩离析，或者被制度变革结束，文化帝国主义却不会有这样的“剧变”，因为文化帝国主义存在于每个统治民族成员的内心，已经化为集体潜意识，注定难以改变。

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首先是一种惟我独尊的傲慢。那种傲慢以群体和个体、自觉与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从贡嘎机场去拉萨所经过的曲水县城，有一个具有典型文化帝国主义特色的“援藏项目”——“泰州广场”。广场占地极其巨大，吞噬无数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着亭阁、石桥、流水，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着一个硕大的不锈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征；一圈牌廊喷涂着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建。我在那广场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砖反射的阳光刺人眼痛，脚下如同一个烤锅。草坪被铁栏围住，写着禁止入内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立陡深陷的水泥槽中，隔绝了人和水的接触。偌大广场只有两条石凳，遥遥对称，只是一种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大太阳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理休闲的人该最多，广场上却不见人的踪影，周边宽阔的大街也如鬼街一样空空荡荡。

这样的广场体现着帝国的居高临下、文化傲慢和财富炫耀，当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发生联系，也不值得考虑和顾忌。或者仅仅是为了引起当地的羡慕和自惭形秽，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楷模与方向标。它所象征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文化暴力与占领。

在统治西藏的中国官员中，文化上的傲慢处处体现。最常听到他们指责当地人懒惰、保守、没文化、素质低、不懂科学，缺乏商品意识和市场头脑等，夸耀的则是自己如何迫使当地人改变观念，整顿作风，奖勤罚懒等。一位在西藏自治区政府主管农业的“援藏”干部曾以他拍的照片向我证实西藏农民之“懒惰”。农田里有很多巴掌大的石块，就是不捡出去，不是懒是什么？其实夏季西藏农区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冲跑，平时阳光又格外强烈，田里水分蒸发过快。把石块留在田里，下雨可压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时石块下又可保存水分，因此是西藏一种传统的保墒方法。然而汉人官员的头脑里，从来不存在藏人可能比自己更聪明的意识。

现任西藏自治区中共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杨松曾这样声称：“达赖几十年没见过西藏什么样，有什么资格谈西藏？我跑遍了西藏每一个县，我比他更有发言权。”先不说这种话良心如何，因为达赖喇嘛几十年不能见西藏正是帝国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首先是缺乏常识。跑遍西藏所掌握的只是信息，信息不等于就是“了解”。真正的了解是出于文化，而帝国官员恰恰对当地民族的文化相隔鸿沟，充满偏见。杨松的言论突出地表现了他对文化的视而不见，这种浅陋甚至解答不了最简单的现象：许多殖民者终老在殖民地也不了解殖民地人民，而曼德拉在监狱里闭塞了27年，难道就没有资格领导南非？

这种傲慢不仅存在于官员，西藏的各种汉人都会认为自己高当地人一等。即使是三轮车夫、水果小贩或包工队的力工，说起藏民都口气轻蔑，把他们视为愚昧落后。一位在西藏旅行考察的女作家对我说，她几乎放弃了正业，精力都用于指导各地的经济发展。她苦口婆心给当地官员上课，告诉他们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为他们设想应该搞的项目，细致到如何推动的细节。她气愤当地官员的冷漠，归结为他们的保守和懒惰。而在我来看，一个写诗歌散文的文人到了西藏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这种不自量力除了出于帝国主义式的文化优越感和惟我独尊，还能有什么解释？我相信她是出于善意，但这种善意足以让我感到羞愧。

1980年代自愿进藏的大学毕业生中有我不少朋友，他们不同于以前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进藏者，也不同于后来追逐功利的进藏者。作为空前绝后的一代，他们在现代西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然而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分析，他们同样也是帝国的成员和文化入侵的合谋者。虽然他们不再是政权机器的螺丝钉，而是个人主义者，但他们把自己视为充当星期五之主宰和启蒙者的鲁滨逊，西藏只是证实他们文化优越的道具和布景。他们身在西藏却始终与藏人隔绝，牢守着同类汉人的小圈子。他们不少人跑遍西藏的农村牧场和神山圣湖，却仍然只是外来的猎奇者或以胶卷文字进行占有的掘宝人。

一幅名叫《干杯，西藏》的油画，用23个人物表现了这个小圈子。其中除了三个不会藏语、用汉语写作的汉藏混血作家，其余都是内地进藏者。那幅画以一种殉难式的宗教画风格自我渲染了他们“进藏”的崇高与牺牲。然而不妨从画作者于小冬的一个例子来看他们如何对待当地的宗教与文化——“于小冬住在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房子非常高大，用巨幅的经幡做了几个不同功能的隔断……小冬说那种黑白相间的巨幅经幡只有在有神性的河边或者山顶才被藏民们树立。他费了好大的功夫和心思，在藏历年藏民们插新经幡的时候‘顺’来了这些经幡。”（张子阳，《西藏人文地理》创刊号，86页）过年时分挂到神山圣水祈求保佑的经幡带着藏人莫大的虔诚和期许，竟被偷来装饰和分隔自己的房间，这中间难道有任何文化上的理解与尊重吗？只有在完全不相通和无尊重的心态下才可能做出这种事。那不是于小东一个人的行为，而是那个小圈子集体的日常习惯。如果有机会看那些人的西藏收藏，几乎每人都有成堆的盗窃品。

我不想把自己排除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之外，有时这并不取决于个人愿望。居住英国的藏族学者次仁夏加在批评我的文章时有这样一段话：“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客观地、通情达理地考虑西藏问题，无异于要让蚂蚁举起一头大象，那不是他们的能力和视野所能及的——无论这些人是中共官员、信奉自由主义的民运分子或者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情况都一样。他们的观念不能不受制于他们的民族偏见，他们的想象也无法摆脱所有殖民者都会自以为是的那些东西的束缚。”（《血染的雪域——对王力雄的回应》，林猛译）

我能理解这种看似激愤过度的话。即使在中国最重视民族问题的民主派人士中，也一样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其典型便是大一统的思维。即使在推行民主理念时，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惟我独尊、居高临下的姿态，自认可以对少数民族的诉求进行裁决，划定只许追求民主、不许追求独立的底线，而不愿意在受压迫民族的立场上进行思考与理解。

汉人民主派一般都不承认中国存在民族压迫，而是归结为专制压迫，并以汉族人民受同样压迫为理由，要求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为中国民主化奋斗，而不该单独追求本民族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专制压迫对不同民族有很大的区别，如汉族学者写出《讨伐中宣部》的檄文，汉族记者发表训斥团中央书记的公开信，都未波及其在体制内的地位，唯色仅仅在书中说了一句对达赖喇嘛的崇敬，描述了一下尼玛次仁的困惑，就被剥夺掉一切，怎么能说是受同样压迫？到过汉地的少数民族人士有共同感慨，汉人敢于发表的言论如果出自少数民族，早就会关进监狱。另一方面即使在汉族民主人士心里，也存在一个不说出口的共识——未来的民主中国将不惜对坚持独立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也要保持国家统一。这就不是专制政权对各民族的共同压迫，而成了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处于专制压迫下的汉族普通百姓也往往在民族问题上自觉追随帝国，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汉族百姓——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内地招来的民工——不仅在帝国指挥下参加对当地民族的镇压，不少人还表现得十分踊跃。

一种貌似公允的观点是：应该强调共同的人性，不要强调不同的民族性，按客观标准、法律和民主程序平等对待一切，不能因为民族不同而区别对待，以免人为地激发民族冲突。但是任何标准、法律和程序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都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帝国主义既然不会随政治民主化同时消失，还会在主体民族的多数成员意识中长期存在下去，那种情况下的不分民族，结果就只能是被主体民族主导，成为对弱小民族的实际不公。尤其是在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人口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代议制民主更可能忽略少数民族的权利。那时没有民族主义的坚守，少数民族的文化就会被多数民族的文化窒息，同时又在民主旗帜和现代化话语面前失去反抗权利。

如萨伊德的精辟分析，当前世界的民主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那种帝国主义不需要政治压制和暴力手段，只靠以自由民主方式形成的“主流”，就足以把异己文化挤压在边缘，使其枯萎直至消亡。很多人反对全球化其实就是反对这样一种“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民族的文化抗争需要民族主义的支持。民族主义在文化抗争的意义上是积极的，只要不转变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尤其不能成为诉诸暴力和冲突的民族主义。一个公允的社会应该给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留出合理位置。

消解文化帝国主义取决民族表述

对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当然是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但是独立难度和代价过高，尤其是民族实力相差悬殊时甚至没有可能。不过若把独立看作保护民族文化的手段，只要能达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目的，是否独立并不重要。而在同一国家内实现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除了需要政治制度提供相应机制，还取决主体民族的帝国主义心态消解，因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机制只有在主体民族的支持下才是真正可行的。

不能单纯指望主体民族自我觉悟消解文化帝国主义，那即使是可能的，也需要太长过程。少数民族一方需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意志表达和耐心说服去主动消解主体民族的文化帝国主义。这就对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表述能力包括很多方面，我想着重强调的方面是掌握主体民族的语言。对此肯定会有质疑：为什么要藏人学汉人的语言，而汉人不学藏人的语言？这的确不公平。主体民族出于文化傲慢和必要性较弱，往往不学少数民族语言。但少数民族如果为了追求平等而拒绝掌握主体民族语言，也就失去了自我表述的能力。因为在帝国体系中，表述空间和载体都被主体民族语言占据。要求主体民族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且主动了解和理解少数民族，固然是有尊严的要求，可能性却不大。坚持这种要求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吃亏。而如果换一种思维，把掌握对方语言当作一种主动进攻，就像学习和使用对方发明的飞机军舰一样，就不会过分缠绕于尊严问题。

因为表述不是自己思考，而是说给外人听。沉默地自我坚守本民族文化只是一种被动抵抗，最终阻挡不住强势文化扩张，避免不了被吞噬的命运；暴力对文化帝国主义也没作用，即便像满洲人那样征服了中国，照样会被中华文化帝国灭种灭族。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只能用文化本身，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展示，感染和吸引对方，才能促使对方放弃帝国主义心态，产生尊重和回归平等。这种主动进攻是对本民族文化最好的保护，同时也能促使本民族文化发展。从这个角度，民族的表述更为重要，要求的表述能力也更高。而这种表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在美学层次使用对方的语言。

历史因素的组合恰好为藏族造就了众多这种人才，其中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和诗人就达数百之多——被称为藏族的“汉语作家群”。其中的佼佼者如唯色、梅卓、色波、阿来、扎西达娃等，对汉语的掌握超过很多汉族作家。藏族内部对这种现象评价不同。一些人认为是殖民主义的结果。的确，分析这些作家的情况，殖民主义色彩相当鲜明。首先“汉语作家群”的多数人都是在“四省藏区”长大。四省藏区是中国有意对西藏进行分治的结果，把西藏毗邻中国的区域划入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四省藏区汉化程度高，藏文教育差。上述几位作家都不会藏文，有的甚至不会讲藏话。除梅卓之外，其他几位都不是纯粹藏族——唯色和色波各有四分之一汉族血统，扎西达娃是二分之一汉族，阿来是半回半藏。他们都有汉族名字并长期使用，配偶也都是汉人（包括梅卓）。还有一个特点是，除了阿来出身普通农民，其他几位的父母都是中共干部，其中唯色、色波、扎西达娃的父（母）亲是共产党最初进军西藏时从康巴藏区招纳的先头部队成员。

问题是简单地把这些作家当作耻辱，还是把他们当作民族的财富与武器？如果承认民族表述对反抗和消解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这个问题就不难回答。事实上，藏民族拥有的表述能力已经得到相当成果，尤其和维吾尔族对比可以看得更清楚。

仅仅二三十年前，汉人对藏族文化的了解还是剥人皮、挖人眼，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社会。而现在，千千万万汉人把西藏当作圣地心向往之，为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倾倒。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藏民族的自我表述推动的。一方面是流亡藏人在国际上几十年不断努力的结果，再通过西方桥梁进入开放后的中国；另一方面西藏本土使用汉语的文化、宗教界人士也功不可没。而这两方面的表述维吾尔族都没有。其实维族在日常生活中对汉语需要更多，因为新疆是多民族共存地域，更需要使用共同语言。现实中也的确能见到不少汉语不错的维吾尔人，但是我却从未见过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作家，也不知道有用汉语传教的维吾尔宗教人士。这和藏族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解释这种现象，可能与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坚守有关。维吾尔知识分子有一种集体的不约而同，在媒体和公共场合排除汉语。六、七十年代改革的新维语今天不但文字上被废弃，口语中吸收的大量汉语词汇也逐步被英语词汇替代。这种替代过程不是串联形成的，而是靠民族主义的社会氛围自发推动。即使是在监狱里，维吾尔犯人谁使用汉语词汇都会受其他犯人嘲笑。我的一位维族朋友从小在北京长大，当年父母特地把他送回新疆，希望他能学会维语。但因为他的维语不好，被其他维族人认为丧失了民族性，不但没人帮助他学维语，反而处处对他蔑视和排斥。那位朋友到底也没有学会维语。可以想象在那种社会氛围中，当然不会有人愿意成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虽然新疆比西藏汉人多得多，从保持民族语言、避免语言同化的角度维族却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内聚性也更高。但是从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却又是在藏族一边。维吾尔人一是不屑于向汉人进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担心政治迫害的国外社会，流亡维族人也拒绝与汉人对话，不参加与汉人有关的活动；二是缺乏能够提升到美学层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汉语表述大都是政治诉求和口号，对汉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说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触。

一个典型现象是，中国内地的高档书店跟藏族有关的书堆满书架，长期热销，而跟维族有关的书却寥寥无几，无人问津。维吾尔族人口比藏族多，同样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汉地的出版社也曾有涉足新疆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的兴趣，但因为几本汉人写的书存在让穆斯林不满的内容，导致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穆斯林激烈抗议和街头示威，甚至出现模仿霍梅尼对拉什迪发出的追杀令，威胁作者和编辑的生命，从此导致内地作者和媒体尽量远离跟穆斯林有关的内容。而维族又没有自己的汉语作家。由此形成一种循环，越缺乏有关维族的汉文出版物，汉族对维族了解越少，越不容易形成兴趣和市场，汉文媒体也就越缺乏关注维族的动力。目前局面正是这样——汉人对维族完全陌生，对维族历史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对新疆问题的认识也局限于当局宣传。大多数汉人对维族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只有害怕和敌对。而这种局面对维族自身其实最为不利。

藏族却因为宗教的包容性（也因为与汉族宗教相通），达赖喇嘛积极与汉人和解的路线，加上拥有众多用汉语写作的藏人文化人，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不断把西藏文化介绍给汉人，使其成为文化热点，甚至成为时尚象征，产生众多“西藏发烧友”。美学层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问题带入汉人视野，使汉人逐步理解和同情西藏的立场。这种以柔克刚的力量可以给其他少数民族一些启发。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世界无敌，西藏不但没亡，反而蒙古族从此归依藏传佛教，不靠别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

弥补民族语言的缺失

藏族的汉语知识分子有一个普遍问题——本民族语言掌握得不好。他们中间的多数不能读写藏文，有的甚至藏话都说不流利。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教育造成。唯色一代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接受的教育，那时四省藏区很多学校几乎完全不教藏语。另一方面也由此才导致他们汉语好到能成为作家的程度——汉语已经是他们的母语。一般而言，人只可能掌握一种足以成为作家的语言。但是当西藏作家协会的主席扎西达娃在国外和流亡藏人见面，双方只能用对藏人而言具有殖民主义象征的汉语进行交流时，足以让海外藏人提出这种质疑：既然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不掌握本民族语言，如何能掌握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又何以能代表藏民族进行表述呢？

的确，民族不是种族，其更重要的内涵是文化而非血缘。如果不能和本民族文化沟通，汉语能力再好也和本民族无关，只相当于给汉族增加了皈依者，成为文化上的汉人。藏语不好确实是唯色一代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看到那是历史产物，责任不在他们本人。我之所以认为藏语不好的藏族作家仍然可以承担对藏民族意志的表述，是因为有两个因素——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可以作为缺失民族语言的弥补，使他们保持和本民族文化的联系，以及表述本民族的意志。

民族主义是当今最主要的民族意识表述，那种表述不需要建立于文化传承的基础，只需要对自己的民族具有认同，也不一定非用本民族语言，反而用汉语表达本民族诉求，更容易被中国当局和汉人社会听到。藏族的“汉语作家群”中普遍存在民族主义意识，虽然一般不敢在政治层面公开表达，但在他们各种以文化面目出现的作品中却是处处都可感受。

在美学领域用文化形式表现民族主义可能是出于不得已，但是效果可能比纯粹政治面目的民族主义要好。因为政治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表达诉求和抗争，但其主要内容只能是争取权利，往往具有清算、对抗和排外的性质，缺乏宽容、妥协与和平，因此往往不利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可能加强敌对与冲突。而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却主要体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继承和坚守，不需要与其他民族对抗，因此可以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说，藏族的“汉语作家群”目前以文化形式表达民族主义，综合效果可能更好。

不过既然文化是历史积累的，很大程度依靠语言传承，不掌握本民族语言的藏族作家惟一能让自己和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民族宗教信仰。藏民族文化大部分都汇集于宗教，民族意识也主要是围绕宗教形成。宗教在现实存在和发展，不像风俗传统正在过去，变成形式，因此只要具有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即使不直接通过语言也能和民族意识相连，以及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在这层意义上，藏族的汉语知识分子信仰藏传佛教就特别重要。这不是从宗教本身说的重要，而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就会失去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惟一纽带。唯色能够成为藏民族意识的表述者和民族文化的捍卫者，关键就在于她是一个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只针对特定人群，他们以汉语为母语，能够成功地为藏民族进行表述，因此以失掉本民族语言为代价换得的汉语能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变成好事的坏事。然而这种逻辑对民族的普通民众是不成立的。普通民众不担负表述任务，失掉本民族语言对他们只能是坏事。作为民族群体，这方面应该向维吾尔人学习，通过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时刻捍卫和传承包括语言在内的本民族文化。

超越“民族内部的私语”

有人会说即使藏族没有汉语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表述也从来都有。哪怕在镇压最烈之时，藏人也没有停止过在私下场合以抱怨、调侃、传播“小道消息”等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然而那类表述多为亲朋好友之间的悄悄话，或者顶多是在藏人场合中“民族内部的私语”。汉人是无从听到的，甚至当局也可以从表面的无声以为“前所未有的稳定”。那类表述的作用相当有限。重要的不是在民族内部私语，而是要有面对汉人民众、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表述。否则汉人民众对西藏的了解就只有当局的宣传，当局也只能透过情治系统和“政策研究”的有色眼镜把握西藏。西藏因此被扭曲，甚至因为没有声音而被忽视。

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汉人游泳家张健曾经横渡青海湖。青海湖是藏人的圣湖，征服性的横渡对藏人而言是一种亵渎。类似的亵渎神山圣湖的行为过去多有发生，藏族虽有广泛不满，但多数只是内部抱怨。张健横渡青海湖时完全没有藏人圣湖的概念，随后又宣布要横渡另一个藏人圣湖纳木措。这时藏人的汉语网站“藏人文化网”发表了一封给有关部门的公开信；唯色同时起草了一封签名书，呼吁张健放弃横渡纳木措。公开信和签名书立刻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开来，被广大中国网民所知。在唯色签名书上签名的数百人中汉族占了近一半。国外中文媒体对此也进行报道，成了一个瞩目事件。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健取消了横渡纳木措的计划，唯色签名书中提到的歌手韩红也放弃了“空降布达拉宫”的演唱会。这个例子显示出，公开化的表述和民族内部的私语，效果完全不同。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者一直在为藏民族进行公开化的表述。西藏问题被国际瞩目和他们的表述分不开。但是对中国的汉人而言，一是因为新闻封锁，二是因为语言不通，影响很有限。况且汉人往往认为海外藏人不能代表境内藏人，其表述是宣传而非真实，因此针对汉人，需要西藏境内的藏人自己出面，用汉语进行表述。

唯色的遭遇无疑说明西藏境内的表述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没有代价就奇怪了。这是必须面对的牺牲，是与帝国主义抗争中不能回避的。民族意识的表述在目前中国只能是一种异议。世界有过很多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异议运动。虽然在西藏形成那种异议运动还很遥远，但至少不能一直沉默，而需要发出公开与可持续的民族声音。

“公开”和“可持续”是两个重要原则。“公开”除了指场合，还需要使用汉语。前几年在拉萨举行的全国民族运动会上，一个藏人混入开幕式舞蹈表演的队列，在场内持续喊西藏独立的口号，但因为没有扩音设备，多数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即使听到，各地来宾也因为不懂藏语，只当作是节目的组成部分。那位藏人足够英勇，却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他的结局和下落从此杳无音讯，人间蒸发，只有藏人口头相传。另一事件是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年晚会上，一个维吾尔人在演出中间径直走上舞台，用维吾尔语朗诵一首政治性诗歌。他也利用了公开场合，但结果和上述藏人一样，多数在场的人听不懂维吾尔语，不知道怎么回事。这种事即使最终辗转传到海外，因为不再是“新闻”，媒体也不再有谈论的兴趣。

类似的抗议行为一直有发生，但都不可持续，只能是一次性的孤立事件，当事者随后就会窒息于铁牢，再也发不出声音。而且那种表达顶多是几句口号，可以表达勇气，却不能产生说服、感化和文化上的互动，可以作为事件给人留下印象，却不能当作道理进入人的思想。

最可能担负公开和可持续的民族意识表述的，应该就是掌握汉语的民族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是因为他们的表达可以直接面对汉人民众和中国当局；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利用媒体，即使在被封杀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中文互联网传播声音；三是因为他们能够融入中国社会主流，从而进入关注中国的国际社会视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牵制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他们因此能比普通人更多地触碰专制底线。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在于其所作所为能被公众看到，因此他们对底线的触碰可以给民众增加勇气。虽然民众的勇气只能一点一滴地增加，但时间积累的结果滴水穿石，会使社会发生很大变化。相比二十年前，今天中国人的恐惧程度减轻了很多，并不是因为当局镇压的能力减弱和专制性质改变，而是专制的最大难题在“法不治众”。只要众人保持在一条平齐线上，暴政往往就无可奈何。由具有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渐进地碰触专制底线，成为能够提升大众勇气的榜样，而大众保持平齐——只要不超越集体的平齐线就有安全——跟进，这是在专制制度中拓展自由空间、克服民族失语和启动异议运动的一条有效途径。

西藏以往没有产生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都被囊括在体制之内，而异议和体制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把持，并且西藏没有形成文化市场——这能看出西藏汉语知识分子另一重意义：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能靠市场谋生，才可以摆脱体制控制，获得表达异议的自由。藏语知识分子的空间只能局限于缺乏文化市场的藏区，离开体制就不能养家活口，而中国内地已经形成广大的文化市场，藏族汉语知识分子可以利用汉语空间解决生存，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摆脱体制的能力。

唯色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例。这一事件可以同时启发很多思考——西藏如何与两种帝国主义抗争？如何产生表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藏族汉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作为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长期通过汉化教育培养帝国在藏族内部的同盟者，虽有成功之处，但也产生出不少和唯色相似的人物。他们的民族意识没有因为汉化教育减弱，反而更为强烈，同时他们又掌握了用汉语表述民族意识的能力。这一代人目前逐步成为西藏社会中坚，未来可能成为藏族各方面的领导者和领头人。西藏会不会出现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又通晓汉语的异议知识分子集团，乃至出现藏族的萨哈罗夫或哈维尔？汉族人士则应该思考这种前景对西藏和对中国，对解决西藏问题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迎接和回应这样的前景？以及如何清理可能深藏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帝国主义。

2004年8月－10月 于拉萨、北京

# 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一次推特对话

来源：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2010年5月22日星期六


 图1为“直播：达赖喇嘛与中文推特网友首次对话”的网络截图；

图2为王力雄博客“王力雄的有托邦”（已被墙）网络截图。

2010年5月，达赖喇嘛尊者应著名作家、《西藏天葬的命运》作者王力雄之邀请，在美国纽约通过推特（Twitter）首次与网民对话大约1小时，回答了8条包括灵童转世、与北京会谈及汉藏关系等问题。整个对话全文如下。



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一次推特对话（审定稿）

2010年05月21日

（达赖喇嘛办公室已根据录音和藏汉文翻译审定了达赖喇嘛的以下谈话）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首先感谢您在日程繁忙的旅程中抽出时间，与中文网友对话。从北京时间5月17日上午10:30开始，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中向您提问，4天多时间，虽然中间有谷歌汇问的宕机，有中国方面随之对谷歌汇问的封网，但还是有1,253人提交了289个问题，并投了12,473票对问题进行评选。

这次您日程繁忙，对话时间不能很充分，但不是希望您这次能回答很多问题，而是希望是一个开头，由此能建立一个渠道，形成一种方式，使您和中国的民间社会从此可以进行自由、持续的交流互动，这将有助于双方了解真实的对方。

谷歌汇问可以让所有参与者对每个问题按照“不错”还是“不太好”的选择进行投票，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序。这次是按照其中的“支持度”排序（Sorted by popularity）向您提交问题。

“支持度”的算法，是赞成票多少与赞成率高低两个因素的乘积。这个算法对目前对话并不完善，因为赞成多反对也多的问题赞成率低，但正说明争议大，恰是更需要您解答的。我想今后您直接与中文网友交流时，可以由您根据情况选择问题，也许更恰当。

下面我开始按“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谷歌汇问（http://goo.gl/mod/Eq6K）中“支持度”的排序转达中文网友提问（注：因为提问者大都用的是假名，而以支持度为据的提问可以代表网友的集体态度，因此不单独介绍提问者）。

达赖喇嘛：好的。首先表示，王力雄先生对今天这次对话搭建了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得以使我有机会与中国民众对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很遗憾的是，过去多年来，我们所做的与中国政府改善关系的努力，一直没有取得实质结果，但是我对中国人民一直抱持很大的希望，信心十足，所以今天能有机会与中国民众直接交流，让我高兴。

王力雄（开始提问）：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达赖尊者您好，我想请问您对于西藏以后宗教领袖的问题。请宽恕我的冒昧。您如何看待您终老后可能会出现像现在的‘两个’第十一世班禅的类似问题？”补充一下，支持度第九的提问：“达赖在大限之后，中共肯定会在国内选一位活佛，对此，您有什么措施？”与这个提问大同小异，两个问题一共得到556人赞成，是目前所有提问中得到关注最高的。

达赖喇嘛：一九六九年我对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宣布，就是未来是否继续达赖喇嘛的体制，应该询问西藏人民，也取决於西藏人民的决定。

同样，在一九九二年我作了一个正式宣示，未来西藏问题解决后，我将不担任西藏政府的任何职务，西藏一切事务，由西藏境内的留任的公务员继续管理。二零零一年，西藏流亡组织的行政首长，开始在西藏流亡社会透过民选的方式产生，任期为五年。

因此，我觉得达赖喇嘛这个体系并不重要。我健在的时候我会努力。对达赖喇嘛的体系，中国共产党比我还要关心（笑）。所以，出现两个班禅的这种现象，是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增加混乱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一的提问中的后一个问题是“另外对于中共所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您如何看待？”

达赖喇嘛：据我的了解，他是蛮聪明的，在佛法上也很努力，但是民众对他还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我认为这主要得靠自己，能否在佛法讲修上做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要靠自己的。

王力雄：支持度第二的提问有444人赞成，也是中文网友高度关注的。提问内容是：“想向尊者了解一下关于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的情况，为什么每次都会无果而终，到底双方在哪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以致谈了几十年仍然无成果？”

达赖喇嘛：主要在于中国官方一再强调没有西藏的问题，只有达赖喇嘛的问题。但我个人其实没有任何诉求，主要关心的是六百万西藏人民的文化、宗教及环境等问题。直到有一天，中央像他们认为存在新疆问题一样，也认为有西藏的问题时，并且要面对这个问题，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会同心协力，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西藏的建设、发展与团结。在目前，中共的做法只是依赖强制性手段，一再强调西藏的稳定，但是，我认为稳定来自于内心的信任与信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有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尊者您好：不管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势会如何发展，现在的汉族与藏族普通百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很多藏民把问题简单的归罪于汉人统治，但其实我们汉人也是这种独裁统治下的受害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汉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九四九年或者五零年才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关系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上。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有时是非常和睦的，有时也是纷争的。现在可以说是一个纷争时段，根本原因是政府造成的，而不是人民。所以，我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在世界上很多自由国家呼吁建立汉藏友好协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实施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应该像胡耀邦那样，为了了解事实去做很多努力。最近温加宝总理的一篇文章肯定了胡耀邦做事的风格，也即不仅仅依据官方的文件，而是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

同样的，在中国境内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以及社会机制的不透明，造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对真相能够透明的话，对於处理并减少贪污腐败等都会有很大帮助。

王力雄：支持度第三的提问中，后一个问题是：“您有什么方法来维护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吗？”

达赖喇嘛：我不管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抱着一个真实的人的心态，由此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汉藏两个民族如果同样持有人的心态，有一个平等基础，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我经常会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诚的，我们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

人与人相互产生怀疑猜忌，这不仅仅限于汉藏民族之间，全世界都一样，因此就需要接触，并且去消除这种猜忌。我在世界上不管见到任何人，都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这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都是同样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第二，才是宗教、文化与语言等彼此的不同。

在一九五四、五五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强调国际主义的，这表示人都是一样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王力雄：支持度第四的提问是：“达赖尊者:《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中，并未写如何保护汉族人在西藏的权益。你是否认同现有藏区汉族居民在自治后仍拥有居住权？你能否发表备忘录来描述如何保障藏区汉族居民平等生产生活的权益？很多汉族人认为你的自治是变相独立，因为他们怀疑自治政府会歧视和驱除汉族。”

达赖喇嘛：早期，在一九五零年前，西藏也有汉人居住。在我出生的地方，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还有汉人。未来的西藏一定会有汉人居民。但是，关键问题是西藏不要成为和现在的内蒙一样，蒙族变成了少数，这样就失去了民族自治的意义。有的藏区，因为汉族人口的增长，西藏的语言和文化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

王力雄：支持度第五的提问是：“请问大师，您书中所述过去的西藏是祥和的佛国，与中国政府所述的黑暗的农奴地区有很大出入，而且很多图片和视频也证实了过去农奴制度的残酷和黑暗，大师可否解释一下为何有这么大出入？”

达赖喇嘛：早期的西藏，也就是一九五零之前，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对于那时的制度不完善，我们是承认的，谁都没有说早期的西藏是像天堂一样。现在的境内外藏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恢复旧的制度，做梦也没有想过。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宣传过去的西藏社会像地狱一样，这种说法与事实也有很大的落差。例如中共曾经制作的电影《不准出生的人》，纯粹是一种宣传，很多藏人无法认同，因为内容与事实不符。比如文革时强调文革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后来，当事实再无法掩盖时，就看出这种宣传没有什么力量。犹如六四天安门事件，全世界都知道，但是中共在宣传时也当成似乎没有发生。

最重要的是，你们每一个人应该公正地、客观地、科学地去调查与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常常也跟藏人讲，不要以为是我讲的你就承认、就接受，你要去观察了解。作为一个佛教徒，即使是佛陀的教言我们也要做彻底的分析与了解。

王力雄：支持度第六的提问是：“如果当局允许您回到西藏，允许西藏自治，您觉得您希望给西藏带来什么样政治制度？”

达赖喇嘛：这主要是通过境内藏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决定。在流亡社会，过去五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王力雄：支持度第七的提问是：“这个问题可能很尖锐，我很想问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对你批评最凶的一条，是说你要求西藏不驻军，说这是变相独立的最根本一点。你现在还坚持‘西藏不驻军’这样的要求吗？驻军权是领土主权中最重要的一个权力，西藏不驻军的主张恐怕广大汉族人民都不能接受，有没有可能，你放弃这一观点呢？”

达赖喇嘛：虽然我们讲自治，但我经常明确地讲，外交与国防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早期我提出过，当印度与尼泊尔等周边国家都友好、互相信赖的时候，西藏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区，这只是一个梦想与远景，全世界都对此有同样追求，所以不用担心。

王力雄：支持度第八的提问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在达赖尊者有生之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趋近于零。请问尊者如何看待西藏的前景？”

达赖喇嘛：从中共立国六十多年看，毛时代，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都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坚信民族政策会发生变化，特别是西藏问题，在互利的基础上能够得到解决。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退休干部与党员，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提出民族政策不合理，需要反思，呼吁改善民族政策。所以，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问题会获得解决。

王力雄：尊敬的达赖喇嘛，相对中文网友提出的289个问题，今天我们只谈了一个很小的开头。新的问题，以及对您的回答的反应，还会在“与达赖喇嘛推特对话”的汇问上不断增加，请您继续保持关注。并衷心期望我们共同努力，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个改变时代的技术，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从官员间的密谈伸展到汉藏民众之间的坦诚相对和民主协商中来。谢谢。

王力雄: 達賴喇嘛已經離開，赴下一個講授佛法的活動。達賴喇嘛離開前表示希望這樣的對話以後能夠經常進行。
2010年5月21日星期五
于美国纽约公园大道Loews Hotel 1014室

【来源：王力雄的有托邦（已被墙）
http://wanglixiong.com/2010/05/17.htm】

# 尊者达赖喇嘛与中文网友的第二次推特对话（全文）

来源：唯色博客——看不见的西藏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中文网友在“与达赖喇嘛对话”谷歌汇问上提的问题，达赖喇嘛从2010年7月19日到24日，通过他的中文推特（@[DalaiLamaCN](http://127.0.0.1:8580/do/zaaZ/totLd5jyPg2Lx0X/b3N2/DalaiLamaCN) ）对“按受欢迎程度排序”前十位的问题做了回答。此次的问答全文如下：

问题一（关于藏青会）：

从现在看来，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难能和中共政府达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后，比较极端的藏青会是否会没有了尊者的束缚而开展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我知道尊者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怎样 防止藏青会走向极端的恐怖活动，不知是否有对策？

达赖喇嘛：总体来讲，我往生之后，西藏流亡组织，特别是教育体系依然会继续运作、发展。另一个重要面是佛法的传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现了一批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学习、能担当宗教领袖的精英。从行政组织上讲，过去十年我处于半退休状态，所有政治上的重要问题都由经选举产生的领导决定，未来也将继续这种模式。

藏青会等一些团体发出批评我的中间道路，寻求西藏完全独立的呼声，而且这种声音近来有所扩大。他们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我们为互利所作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们的意见越趋尖锐。然而，总体来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信赖非暴力的和平路线，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担心。以上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问题二（关于“大西藏”）：

达赖喇嘛尊者，您寻求自治的大藏区与现有中国的省份行政区划有很大重叠部分，请问您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重叠区域的其他民族中国人是否由“大藏区自 治政府”来管理？这部分非藏人的意愿如何得到保障和贯彻？谢谢！

达赖喇嘛：我们从未提过“大西藏”这个词，这是中共统战部等反贴在我们头上的。我们的诉求是，语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护、发扬宗教文化的同等权利；以及经济发展等的平等权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自治区及其他四省藏区的发展要统一部署的政策，温家宝也在人大工作报告中有同样的宣示。这是符合现实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认为是西藏自治区。然而，自治区只有二百多万藏人，其它近四百万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们要求平等、同一的权益。比如我，也不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而是青海。从历史上来讲，现今的四省藏地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当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这些藏区，而来自自治区的较少。所以，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与文化，因此提出了统一的诉求。如果我们寻求的是分离或独立，那就另当别论，然而，我们提出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中寻求保护发扬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语言文字。

相关自治的具体的细节，如有机会详细讨论，应由境内藏人负责，在无恐惧的环境中能进行自由协商，相信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关于西藏的汉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对话中我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区，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汉人，康和安多地区，特别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汉人，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从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不允许汉人或其他民族居住。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称之后，应该是藏族为多数，其它民族为少数，如果颠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义。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像历史上汉藏民族千年共处的友好大家庭；也祈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民族抱着平等一家的心态和睦共处。

问题三（关于凶天）：

达赖喇嘛，去年一家法国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记录片《The Dalai Lama’s Demons’》。片子在印度拍摄。片中，信奉Dorje Shugden的藏僧在流亡藏人的社区中被到处驱赶，他们不能进入商店，医院，甚至赖以为生的寺庙.在片中，您发布命令所有信奉Dorje Shugden的僧人必须被驱出寺院。我引用一位被驱赶的藏僧的原话：一方面达赖喇嘛在总是说宗教自由和慈悲，另一方面，他在禁止我们的宗教自由，并把我们驱赶出寺院。他在自相矛盾，我不再相信他的话。达赖喇嘛，请问您是怎么看待他对您的评价？

达赖喇嘛：关于朵杰或凶天的问题，讲起来比较复杂，因为这牵涉到宗教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或不承认宗教的人，很难了解与理解。凶天出现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五世达赖喇嘛是怎样评价凶天的呢？五世著作“11卷”中写道：“邪愿毁戒变此怨鬼”。怎么讲呢？凶天的起因是发邪愿；本性是毁戒的怨鬼；行为是伤害众生。凶天自己也承认是毁戒的怨鬼。

所以，曾经我也供奉过凶天，但看到五世达赖喇嘛的教言之后，经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得出不宜供奉凶天的结论。因此，我就停止了供奉， 但是，当时藏人中还有少许人在供奉，我并没有禁止。

我们从未将供奉凶天家族的孩子驱除学校，没有这回事。在寺院中，大多数不供奉凶天的僧众与少数供奉者一起进行佛事活动，这不符合宗教誓言上的教诫。不供奉凶天的僧众都从达赖喇嘛这里接受过教法传承，而供奉凶天者置疑达赖喇嘛，这样就产生不和谐。然而，至今从未有人因供奉凶天被驱逐藏人社区。

欢迎你们来印度，到印度南部参访，在那里供奉雄天的的僧众，他们单独建立起寺院，过着跟其他藏人一样的生活，没人去干扰他们。

总而言之，我的立场是：信不信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信什么样的宗教，是个人的选择，因此，依止或供奉什么样的神、鬼，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解说供奉凶天的利弊得失，是我的责任，听与不听每个人自己决定。

一个汉族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有兴趣，这是你的自由，但希望你认真观察了解。平常我们学佛的人讲：“对人要净观；对法要观察”。因此，对法，必须要进行分析，比如，即使是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也要分析“了义”还是“不了义”，这是龙树菩萨等的传承，所以，有“依法不依人”之说。你们也要观察分析，这很重要。

问题四（关于08年拉萨事件）：

我想问在08年的西藏事件中，为什么那么多的僧侣藏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要知道，政府才是始做俑者

达赖喇嘛：据我所知，2008年的抗议事件，开始于3月10日，之后11、12、13日陆续发生了抗议，当局还派武警制止前往拉萨市区抗议的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众。一位现场目击记者告诉我，14日上午在拉萨发生火烧商店等事件时，警察们除了摄影之外，不作任何干预。这很奇怪，中共只提“3.14”，从不提之前发生的事，似乎故意让14日上午发生事情，然后一一摄影“取证”之后，指控藏人骚乱。

之后从拉萨来的藏人告诉我，当时他们看到当局运来了很多外人，14日当天的主事者几乎都是他们。按道理讲，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公正的调查机构作客观、彻底地调查，这样真相会大白。另外，当时在康和安多地区，当局把寺院的护法殿中，藏人按照传统习俗献供护法的刀枪子弹撤下来，指控这是寺院僧人准备从事恐怖活动的证据，这些都是不符事实的。

不管怎样，在当时情绪高昂的状况中，有的藏人在愤怒之下变得不理性，如有一些藏人，对汉族同胞进行了骚扰，对此，我深表歉意！当时中共的宣传谎称，这是藏人在反对汉人，但是，绝大多数藏民并非如此。藏人反对的是中共的政策，因为爱护自己的宗教文化，以及信奉自己的喇嘛而遭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藏人的内心因此而冰冷，反对这种政策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愿你们不认为这是反对汉民族。

据我所闻，08年三月事件之后，很多藏族商人、学生、游客等到内地时，因为是藏族的原因，出现住不到旅馆进不了饭店的状况；而且当中国官方的一个出访团在机场，只有其中的藏人成员受到边检的特别盘问时，怎么能不让藏人感到心寒？

问题五（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共）：

请问尊者：当年和平解放西藏事先就是个阴谋哩还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因何而变？您是当事人，也受到中共厚待，请简单说一下好吗？

达赖喇嘛：这很难讲，当初中国解放军攻打昌都时，七八千藏军被消灭，那时在昌都总管部门任职的官员，门仲•堪穷后来告诉我，当时王其梅将军流着眼泪说，这是我们兄弟民族之间的残杀。因此，他们的初衷也许是真诚的。另外，在修筑川藏、青藏公路时，有的战士用身躯来阻挡洪水土石等，的确付出了代价，这些人也是真诚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当初的想法是什么，我难以定论。

如果政府能将当时的秘密文件解密，提供给历史研究人员做详细的研究，这样会很清楚，才能真相大白。

从总的政策来看，我于1954年前往中国，在内地住了五六个月。那时，我多次与毛泽东相见，特别是前往不同省份去参观时，见了很多中国官员，我感觉到，他们是一批具有革命精神，一心一意为劳动人民和国家服务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毫不利己，专门为公，他们的作风吸引了我。特别是毛泽东，他对我作了很多承诺，但在1956、57年之后变了，整个政策走向了左的极端。

问题六（西藏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请问达赖喇嘛，如果未来内地实际拥有一个符合政治概念的民主政府，您认为西藏与这个政府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实现与内地政府这种关系的“西藏”您认为应当是怎样一个疆域范围？

达赖喇嘛：我认为目前中华人共和国的外交也好，内政也好，很多不必要的纷争是因为没有信任，以及猜忌和疑虑所致。过去五十一年我是住在境外，不管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日本、印度等，我有不少朋友，稍微了解一些情况。中国虽然希望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但无法如愿以偿的最大原因，是相互没有信任。没有信任的关键，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机制不透明，表面上的呈现与实际状况有很大落差的原因。

不管是西藏问题，还是新疆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和民众的实际感受相差很大，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行一个内外透明、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政策，很多问题会迎刃而解。

关于西藏问题，我们没有寻求独立。虽然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注重的不是历史，而是未来。因为西藏在物质发展上的落后，我们认为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对西藏的发展有利，所以，我们不求分离。

最重要的是，西藏具有特殊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字，从宗教上讲，当今世界上很多学者异口同声表示，藏传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内容最博大深奥的佛教传承。这样博大精深的内容，能够延续发扬，是因为藏文这个优秀的文字所记载，从梵文音译和意译的内容，都是正确无误的。因此，如能保护好我们的宗教和文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是有益的。 总体来讲，中国本身可以说是一个佛教的国度，近来信佛的人也日趋增多，我想我们可以利益双方，是互利双赢的。

问题七（西藏的民主化）：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假如争取到西藏高度自治或独立，您是否有计划使西藏的执政制度民主化？如何保持政教分离？

达赖喇嘛：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作特别回答，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到印度来，你会看到在流亡期间我们是怎样实施民主的；五十一年来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我们的未来设想等，您看到后就会明白。

就我个人而言，早在1969年就公开宣示，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延续与否，应由西藏人民决定。因此我个人没有任何担忧。

最关键的是，需要拯救、发扬藏民族特有的宗教与文化；另一方面，是西藏的生态保护，我们希望在建设、开发过程中，不要破坏到西藏的生态环境。西藏高原的生态非常脆弱，如果遭到破坏，这样高海拔与空气稀薄的生态状况，恢复起来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如西藏高原的冰川，是亚洲很多江河的发源地，这就需要特殊的保护。

问题八（达赖喇嘛的权威）：

达赖喇嘛将如何看待死后流亡藏人的权威整合，一旦达赖喇嘛的权威不在，而按照现实又不能实现达赖身份的转世，那么继任者的权威能否压制激进的藏民族主义，而实现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

达赖喇嘛：即使我不在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在二三十年前就一再告诉流亡藏民，不管你们担任政、教上的任何职务，就当着我不存在的模式来承担责任，他们正是是抱着这种心态，累计经验，步步向前的。

现在是每隔五年产生一个新的领导人，明年就会产生人民直接选举的新领导； 宗教方面，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会承担宗教传承方面的责任，我的在与不在，其实没什么区别。

问题九（西藏政治制度的变迁）：

请问达赖喇嘛，您一直提出西藏要民主自治，而在您以及您的前世统治的西藏是否实现过民主统治？如果没有，那么为何您觉得您会比中共更能实现在西藏的民主统治？如果实现了西藏独立自主，那么您又会如何分配现在追随你的那么多僧侣的权利，这种权利分配又将和60年前在西藏统治的僧侣集团的性质有何不同？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到四世达赖喇嘛都从未涉足政治。第五世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的政教领袖，那时，不管是东方的中国，西边的印度，北部的俄罗斯，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同样都是一种封建制度。但是，因为佛教，整个西藏普及了非常强的、给予所有众生的慈悲观念。比如，在1959年之后实行“民主改革”时期，很多被批斗的地主是由他们的仆人救出；后来流亡到印度的不少地主，也是他们的仆人们通风报信之后才得以逃脱而来，因此，虽然是同样的奴役之名，但实质大有区别。

在四川藏区，1955年就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民主改革”，但在藏地不适合实行与中国内地相同的改革方式，所以出现了问题。你们当然不一定要认同的我的观点，但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客观、彻底的深入调查和研究，这样的结论很重要的。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他的晚期，思考了民主的施政方式，但未能实现。1952年我在拉萨时，成立了改良委员会，开始进行对税赋和债务制度等的改革，但是未能完全实施。

因为早在西藏就有这种改革的想法，因此我一到印度就建立民主机制，实施改革方案。早在1992年我就公开宣布，未来西藏问题获得圆满解决，境内外西藏同胞共聚一堂之时，我将不担任任何职务；有一天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人民获得真正的自由之时，我们将返回家园，那时，我将历史上赋予达赖喇嘛的所有特殊职权，全部交给地方政府。我的想法依然坚定不变，从未想过未来要担当什么职责。

问题十（如何看待藏地汉人居民）：

达赖喇嘛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藏地汉人居民，尤其是居住在藏地的第二代汉人?对他们来说，故乡只意味户籍上的显示，而西藏已是不折不扣的家乡。高度自治有可能使其处境边缘，这就是很多反对您和流亡政府的藏地汉人的担忧。您对他们是否有话要讲。

达赖喇嘛：西藏作为一个“自治”的地方，藏人不能变为少数，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不反对汉族朋友的居住，如果汉族朋友能够尊重、关爱西藏的宗教文化，我们一定欢迎他们。

我有时开玩笑说，汉族给藏族好吃的食物，藏族给汉族佛法上的精神食物，因此根本不用操心。当然也有一些汉人会歧视藏人，认为藏人有臭味、很肮脏；信仰宗教是低俗的行为，这样的人，可以离开肮脏之地，回到自己干净的地方为好。

过去，在西藏的寺院中也有学佛的汉僧，但当时从未有过民族之分，佛陀的教法中，本来就没有民族的区分。过去西藏寺院中，有很多蒙古人担任堪布（方丈），虽说是不同民族但从未排斥，未来如有汉人能苦学经典，成为智者的话，也可以担任西藏的堪布，甚至上师。

【由王力雄 @[wlixiong](http://127.0.0.1:8580/do/Q_ak/otoLw5jPPN8LxjX/b3N2/wlixiong) 汇总。】

# 达赖喇嘛访谈录

茉莉

记者按：正是印北山区春意盎然的时节，记者在举世闻名的山间小镇——达兰萨拉，对西藏流亡社区进行了长达两周的访问。

在这期间，记者有幸获得达赖喇嘛的两次热情亲切的接见，在访问开始时，记者代表对西藏人民怀着友好感情的中国朋友和《北京之春》编辑部，向达赖喇嘛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记者本着沟通不同观点的各方,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的愿望，请达赖喇嘛允许记者提出一些敏感的、但却是普通中国人希望了解的问题。

达赖喇嘛用中文回答说：“很好！很好！”

第一次访谈

（三月十日上午11点11分开始）

茉莉：今天我看到了您发表的在“三·一十”纪念集会上的讲话。我注意到您的这次讲话有几点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说，这是您第一次在纪念西藏自由抗争的集会上，向您的人民正式宣布，您寻求的只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而非独立。其次，您在讲话还谈到流亡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在不进行全民投票下授权您继续为西藏作出决定。我想请您就这两个问题谈谈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关於我们不追求独立只是寻求自治，这个内容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至於过去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了，或者被人理解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我心中已经决定了，我们只是追求自治。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使用的是“西藏人民的幸福”这个词，即不使用“独立”这个词，也不使用“自治”这个词。因为谈“自治”西藏人不高兴，而“独立”这个词，在我的心中已经决定把它排除了，所以我就经常讲“幸福”，“幸福”，“西藏人民的幸福”。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们和中国政府直接有了联系，当时是通过香港的新华社，中国政府和嘉乐顿珠（记者注：达赖喇嘛的哥哥）发生了联系，由於当时我心中已经确定了不谋求独立，所以我马上对此作出回应，和他们进行联系。这个“中庸之道”在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广泛地向外宣布。从那以後的时间，至今已经五、六年了吧，我们就非常明显地告诉他们，我们要的只是“自己治理自己的土地”。现在已有许多藏人认识到，我讲的“中庸之道”是很有意义的，是很关键的。至於第二个有关全民投票的问题。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为此在西藏流亡者之中进行了民意调查，虽然在西藏里面没有办法进行民意调查，但是通过各种办法，还是搜集了一定数量的代表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的意见，汇集到这里来。藏人一般都认为喇嘛最了解全局，也对西藏各个方面了解得多，也就应该由达赖喇嘛根据实际作出决定。

茉莉：您在今年的“三一十”讲话中表达了您希望和中国政府对话的真诚愿望，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作出积极的善意的回应，不知您是否已经通过其他途径寻求和中国政府对话的可能？

达赖喇嘛：有关这个和中国政府对话的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方面正在作出努力，许多外国朋友个人对此也很关心。

茉莉：您提出的只寻求真正的自治而不追求独立的方针，是否能为大多数西藏人民所接受？您一再强调走“非暴力的道路”，但是仍有一些藏人在发表主张使用暴力以争取自由的言论，所以一些汉族朋友想知道，您对主张使用暴力的言论采取什么办法约束？是仅仅从佛法教义角度进行劝戒，还是像民主国家那样以行政法令加以禁止？

达赖喇嘛：一般藏人从个人来讲，对中国人一直抱着很难信任的态度，认为和中国人一起过很麻烦，很难过的，是过不了的。但是藏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对达赖喇嘛非常信仰，他们的信仰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认识，认为达赖喇嘛这样说肯定是好的，肯定是行得通的，肯定是对藏人有利的。他们都抱着这种态度支持达赖喇嘛。

比如说我自己讲中庸之道，许多藏人都表示支持，但如果中庸之道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讲，那么支持率有多高，就很值得怀疑。可以这样说吧，藏人支持的是人而不是观点，这是非常可虑的。由於他们对达赖喇嘛的敬意和信任，使他们相信，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达赖喇嘛能给我们带出一条好的道路来。他们相信这一点。

有关暴力的问题，暴力是不好的，必须要走非暴力的路线，所以我平时从宗教的角度经常对藏人进行教诲。但是我们是流亡者，我们不可能在行政上、法律上进行什么限制，当然，西藏的宪政要则、西藏流亡政府所规定的行为规则等法律性的文件，在那里面规定了我们要走非暴力的路线。我经常这样说，如果西藏人民采取暴力路线，那么我达赖喇嘛一定要辞职。这是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这么说的。

茉莉：我们有一些汉族朋友想了解，您对一九五九年以前的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怎么看？如果不是中共宣传的“反动的落後的农奴制”，那么您认为是什么？至今仍有一些汉人经常提到旧西藏社会使用酷刑、剥削、迷信等问题，我想知道今天的藏人对过去的这些历史问题怎么认识？今後如果西藏真的得到了自治，你们将如何顺应历史潮流？

达赖喇嘛：没有一个藏人认为，旧西藏是完美无缺的。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後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当时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农村的情况。回来後，大约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个叫“改革会议”的改革组织，那里面不仅仅是西藏政府官员，藏人所称的“会议”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

就赋税和西藏的“乌拉”差役，也就是劳役等方面开始进行改革。当时就已经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

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後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

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不一样。这里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是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这主要是有一些爱和慈善的因素在内。当然个别的危害人的现象不是没有，是有的。

我们从西藏流亡过来已经三十九年了。在这三十九年之间，我们建立了很多的定居点，建立了我们的流亡政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藏人自己建立的，不是共产党来帮助我们的。你可以看看它们是不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制度。因此，只要给藏人机会，藏人是会自己作出改革的，就象刚才所说的，没有一个西藏人认为旧西藏是非常美好的，不，他们都认为它是有缺陷的。这种改革当然需要时机成熟，它是自己改革而且是能够改革的，会改革的，藏人有这种能力一定能做得到。（茉莉插话：我在这里已经看到了。）

如果有这么一天，流亡政府和西藏里面的藏人团聚的那一天到来，我已经完全作出决定，不参与政府的工作，不担任任何的政府职务。未来的西藏政府必须通过人民选举而来。

茉莉：去年十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时，流亡藏人展示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阵容，据说占了游行抗议队伍的百分之八十的比例。由此引起了中文电子刊物上有关西藏问题的大讨论，就连过去对西藏问题不太关心的中国海外学人，这之後也纷纷卷入了这场大争鸣，支持西藏的和反对的针锋相浴，有个中国人说，他头一次听魏京生说五十年代中共对西藏人做得那样残忍，良心受到很大的震撼，他希望能向达赖喇嘛您道歉。

面对这些情况，不知您和西藏流亡政府是否有和汉族人民做一些互相沟通交流的计划？

达赖喇嘛：有百分之八十吗？那里面有许多美国人吧？（茉莉回答：是，但是他们是为西藏自由参加抗议的。）

与中国兄弟姐妹进行联系和交流，我们一直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把这看得很重，这几年来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我想我们应当多出版一些中文书刊，与中国人民更多的建立联系，多接触，有能力的话抓住一切机会去接触。我经常这样讲，至於具体计划我却不太知道，因为那是外交与新闻部那些机构做的。

西藏和中国之间要互相了解，互相了解双方的苦难、双方的心愿以及双方的情况，这些必须要做到，我们要为此作出努力。这些言论我在二十年来就一直在讲，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前，和中国人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没有人去关注，当时也没有过中国人来这里。在天安门事件以後，和中国人联系就容易多了，方便多了，也就有人关注这个问题了。

茉莉：有些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国家人民支持西藏的强大舆论压力下有委屈情绪。他们中有的是曾经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认为自己当年抱着让西藏早日摆脱贫穷落後的愿望，充满了奉献精神，到西藏真诚地贡献了青春和汗水，结果却换来了“侵略者”、“走狗”的名声；有的人认为“人命都是一样值钱，藏人吃了苦，我们汉人也一样受迫害”；还有的住在“大西藏”——三藏区内的汉人，担心西藏独立或自治後会发生“驱汉事件”。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达赖喇嘛：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八年，我一直是和中国人在一起工作。我看到一些汉族共产党员，确实是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到西藏，要为穷人服务，要为西藏服务这样的崇高理想，这样的人我见过不少（达赖喇嘛用中文补充说：“很多，很多。”茉莉大笑）。这样的人中也有藏族共产党员，他们忠心耿耿，确实自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民族和西藏一定能够进步发展。

但是持这种观点的藏族共产党员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间发生了变化。从五七年、五八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指责他们是地方民族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

在中国派到西藏的汉族干部之中，也有许多是满怀虔诚，这样的干部确实是有。其实大部分人并不了解所有的事情，除了共产党的宣传之外什么也不懂。

在你所说的“大西藏”，也就是三区一带的中国人，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一些中国人在那里定居。在康定等地方，也有一些中国人定居，他们在那里世代居住，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从来没有过任何纠纷。他们中有许多是佛教徒。

另一个方面，有些新到西藏的，由共产党派来的，或是由於经济原因，在经济开发时来赚钱的，这些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是中国人，就把他们一概而论，必须要有所区别。

如果他们要留在西藏，如果他们尊重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纠纷和问题的。当然，如果他们蔑视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藏人可能不高兴，我想他们住在西藏也可能不舒服。为了双方能共同在一起过好日子，怎样才能使双方都能幸福地过日子，这些方面，只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就一定会找出一个好的办法解决。

茉莉：西藏民族要走向现代化，在现代化与藏族民族传统之间是否有冲突？有的汉人认为藏人迷信佛教因此阻碍了现代化，不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在藏人的传统习惯中，有一些是在封建制之下产生的，由於当时的社会因素而产生的一些习惯，这些习惯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自然消失，因为它们没有了生存的基础，这些东西自然消失是没有什么可惜的。另一些方面，比如说西藏人对众生的慈爱观，他们见了一个虫子，会说：啊呀，它真叫人爱怜，我要救活它的生命。这些有关爱心、利他的思想和观念，这个传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和现代化没有任何冲突，这是应该保留的。

比如说当今的欧美，它们外在的经济发展是相当令人注目的，但是在内在的方面，如何作一个善良的人，利他利人，这些传统有所削弱。由於这些传统的削弱，使得欧美国家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一些人在心理上出了问题。所以许多的外国专家、社会学调查团体和社会服务团体，他们都说，西藏社会的传统中有许多爱人、利人和慈悲的观念，这些观念非常好，他们都反过来想学习。

你刚才说到迷信佛教，在西藏人当中，是有许多人由於不懂佛法而迷信佛教的，但是，因为不懂而迷信不等於佛教本身是迷信。我对世界上一切宗教都抱着尊崇的态度，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真正了解它，我认为佛教不是一种迷信。

比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科学发展中如果需要宗教的话，那么这个宗教就是佛教。我曾经和许多学者、科学家见面谈过，我们谈论世界的产生，以及心灵与肉体的关系，还有原子、电子等等无限地分下去。我们对这些问题前後认真讨论过七次。通过这些讨论，我非常明确地发现，佛教和科学并不相悖，佛教和科学的一些观点是相同的。科学家可以从佛教里学到很东西，佛教也可以从科学中发现新的观察角度和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双方都是互有补益。

茉莉：您说的非常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来达兰萨拉之前阅读了一些藏族诗歌，其中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的诗歌非常优美，他的诗有很大部分是歌咏情意缠绵的爱情，表现爱情与宗教的矛盾。为了爱情，他宁愿交出“达赖喇嘛”这顶桂冠。不知您怎样看待您的这位前世？

达赖喇嘛：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他是先出家，然後他又把自己的戒律奉还出来了，这样他就没有戒律的约束了，他不愿意受戒律的约束，那是他的自由，这就对了！（双方大笑）

至於宗教生活，俗人也可以过宗教生活，僧侣也可以过，这是不同选择，走得都是一条路，都可以过，都是一样的。

茉莉：我的一些汉族朋友认为，既然您仍然愿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希望您将来回到中国去，以您的慈悲、爱心、智慧和包容力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发生影响，这可以使当今中国避免许多矛盾和冲突。

达赖喇嘛：我已经上了年纪，所以希望将剩余的时间用来专心於宗教，教导人民互爱、和睦、团结等等方面。至於对象，是不分亚洲、欧洲、美洲的，也不分中国、西藏，只要人们愿意，我现在是这样，以後还是这样。如果有一天回到西藏，对中国、对西藏、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去了台湾，在台湾见了许多中国朋友、兄弟姐妹，我们都很高兴，我也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像对待西藏人一样对待中国人。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个愿望，希望能够到中国去朝圣，特别是去中国的泰山。即使现在的政治问题和那些纠纷还不能解决，这些先放一边，我先去朝圣。我一直有这个愿望，特别是想去泰山。

至於政治活动和政治事务，如果有一天西藏人能返回家园了，我是已经下定决心了绝对要结束，比如说担任什么职务啊、什么名义啊，这些我下定决心要结束。

茉莉：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却是关键的历史问题要向您求证一下。今天是三月十日，三十九年前的今天，西藏的拉萨发生了起义事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说，当时是您自己主动提出要去看军区文工团的文艺演出的，後来反动分子借此机会挑起了一场叛乱。

达赖喇嘛：先邀请後答应，和没有邀请我主动提出是两回事。当时是他们先邀请我，我说：那好，我去。不是他们没邀请我而我自己要去看戏，不是这样。（哈哈大笑）。

茉莉：最後还有一个问题。据我所知，关於西藏问题，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有了第三种声音，他们认为以往的西藏研究大都逃不出两种局限，不是站在您达赖喇嘛一边，就是站在北京一边，所以都不足信。一个叫做王力雄的中国大陆作家深入藏区十几次采访，现在他写出了一本书，据说是力图超越这两种局限。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达赖喇嘛：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一定要相信西藏流亡政府所说的，或者相信中国政府的，最好是自己亲自去调查。这位作者（指王力雄）如果去过西藏十几次的话，他去调查最好。即使去过西藏的人，也不一定完全了解西藏，这位作者不应该只到西藏去，也应该到印度来，听听流亡藏人怎么说，看看逃出来的每一个家庭，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至死，他们有什么样的苦难。如果有一天，西藏人没有恐惧了，在真正自由的条件下，调查应该会是公正的。但是，在充满恐惧不自由的情况下，要作出公正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去问的人有胆量，你不恐惧，回答问题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和胆子，他可能不敢说真话。所以，只有在自由的无恐惧的情况下调查才会是公正的，他（指这位作者）应该两边都去看。

我刚才在会上（注：指在接见记者之前的“三·一十”集会讲话）和藏人也谈到，不管任何人，我们非常欢迎来调查，来这里仔细看。我想今天这个集会上，可能有不少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人，对此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按道理应该把他们请到贵宾席上。我希望他们回去向上汇报，一定要调查得清清楚楚，把事情搞清楚，公正地报告上去，不要把事情扩大，也不要缩小，也不要走马观花、雾里看花。总之，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

茉莉：我很抱歉，我耽误了您这么多的时间，而且老是问您这么麻烦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的？

达赖喇嘛：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谈一次，（茉莉用藏语回答：“Naise”好的）。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我们有什么不足之处应该改正的，希望你能够提出。（接着用中文说）有批评也很好！

茉莉：谢谢！我们很多中国人说，您的存在不仅是藏族人民的福气，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福气。我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再见时，我还会有许多麻烦的问题问您。

达赖喇嘛：这样的问题，请你继续给我提，越麻烦越好！

第二次访谈

（三月十五日上午11点半开始）

茉莉：（双手合十用藏语祝祷）扎西德勒（吉祥如意）！

达赖喇嘛：（回礼）扎西德勒！

茉莉：目前有些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批评北京和达兰萨拉双方的宣传机器都在制造谎言。例如，以西藏自治区目前到底有多少汉人这个问题，您在一九八七年宣布的是，不包括军队，西藏自治区的汉人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九十万，这种说法被国际社会广泛引用，而中国政府方面宣布的数字，一九八七年西藏自治区汉人总数仅为7，88万，两者相差24倍。另外一些汉人对西藏流亡政府说的中共统治西藏以来有一百多万藏人遭到杀害这个数字表示怀疑。

达赖喇嘛：我认为，关於有七百多万中国人迁移到西藏的说法，是指西藏三区，而不仅仅指西藏自治区。至於在西藏自治区有一百万余人的说法，当然我们不能去实地调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中国人在西藏已经形成了许多地区，当然我们没有考虑他们是否持户口等等，我们只观察在西藏有多少中国人，还包括军队，比如说在贡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林芝地区，几乎是由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城市。从这些方面推测，根据藏人们报来的情况分析，估计在西藏的中国人应该已有七百多万人口，这个数字可能有错，但不会有太大的距离，当然这些是根据推算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到里面去调查。如果一定要查的话，也可以去里面去调查。

关於有一百二十万藏人遭杀害的说法，这里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这些人不完全是在战场上打死的，第二，不是说某一个年限，比如说某一年杀死了一百多万人。

这个数字是从中国军队进入西藏，一九八三年以前，这一期间，由於中国人进入的原因而死亡的藏人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中包括战死的可能有二十万人左右，还有许多人死在狱中，比如说达赖喇嘛的医生，他被关进监狱时，一同被关押的大约百余人，活着回来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他很多人是饿死的。由於饥荒，安多那一片大约是在一九五九年期间发生大饥荒，大批的藏人饿死，今天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是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大批的人饿死，像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八四年为止。还有许多人是经受不起侮辱虐待，自杀了。

我们通过调查，是很多人来报告，说我们地区有多少村庄、多少家庭，有多少多少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我们收到很多材料和数字，把这些数字统计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大约有一百二十万西藏人死去的推算。这是中国进入西藏以後，到一九八三年为止，这几十年来，由於各种受迫害的原因死去的人口统计数字。

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在《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这本书里有有关的统计数字，可能上报来的统计数字有一些重叠，例如某一件事情，有两个人来报告，因此重叠了。像这样的事情是技术性的，难免的。（茉莉表示同意说：是难免的。）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符合真实的科学性的调查。最好是有人进行公正的调查，但调查必须在调查对象是自由的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是公安局今天可能来抓我，明天可能来找我的麻烦，那么这样的调查就没有公正和准确可言。比如说很多事情，如中共文革期间有吃人的事情，现在这时候才被揭发出来，当时并没有揭发出来。许多事情都需要经过公正调查才能揭露。

茉莉：“政教合一”对西藏人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个制度和欧洲中世纪制度一样落後过时。您对此有何看法？

达赖喇嘛：“政教合一”在西藏历史上，是由於一个宗教领袖如达赖喇嘛、八思八等等，由於他们在宗教上的威望，因此变成了政府领袖，或者是一个政权的领袖。这样的制度不管原来对西藏来说怎么样，无论如何，未来是不应该再有了。所以我已经决定退出未来的政府，这我是已经作出决定的。未来的领袖只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茉莉：您在今年“三·一十”讲话中提到：“现在西藏人的挫折感越来越强烈”，您为他们很担心。如果您将来不幸在这里（注：指达兰萨拉）圆寂，情况会怎样？中共方面的看法认为，如果失去了您的这面旗帜，那么流亡藏人就不会再在国际上有地位，你们的事业也就会自行垮台，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准备？

达赖喇嘛：如果达赖喇嘛突然没有了，对西藏的事业肯定有所削弱。但是这只是一时之间的削弱，因为从长久来说，不会有削弱的，西藏民族还会继续斗争，因为这个矛盾仍然存在。西藏的斗争不是为了达赖喇嘛个人或者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如果仅仅是为了达赖喇嘛个人和这个制度，那么随着达赖喇嘛的消失，这个斗争和这个制度也会消失。但不是这么回事，它关系到整个西藏民族的问题。所以这个斗争不仅会存在，而且一些藏人还会有使用暴力的倾向，这种倾向使我十分担忧。现在因为我的存在和我的“非暴力思想”，有些人还有点收敛，不敢放肆，但是以後会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为此很担忧。不管怎样，西藏的事业还会存在。

从过去的历史看，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到西藏，到一九五七年为止，这期间安多有许多藏族共产党员，他们根本不信宗教，而是相信中国共产党会把西藏领导好，他们只有民族意识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而是站到了西藏人民一边。这完全不是由於他们对达赖喇嘛的信仰，或者是由於宗教信仰等等，这唯一的原因是由於他们属於西藏民族，他们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如此看来，未来西藏民族问题的存在，不管达赖喇嘛在与不在，有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些人就会过来。所以，关键是问题还存在。

茉莉：是的，我在这里访问期间，对你们的民族感情、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体会很深。真不好意思，我又占了您这么多的时间。您刚才讲经回来已经很辛苦，现在应该休息了。我在这里告辞了，祝您健康长寿！

达赖喇嘛：（意犹未尽地）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相当强啊！（哈哈大笑）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意识，藏人有藏人的民族意识，重要的是两个民族的团结，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应该相互帮助、互利对方，而不要相互欺负、相互危害。

茉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现在开始很羡慕藏人了。因为藏人无论怎样苦难，他们有您这个慈爱的佛祖作为精神归依，而我们中国人没有，我们从历代君主到当今中共领导人都是在压迫人民，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比如说我现在被逼得流亡海外，一颗心总是漂泊，没有归依感。

达赖喇嘛：（不语，只是轻轻抚摸茉莉的手。）

茉莉：我还要向您做检讨，上次我们会面时，我不懂一点佛教规矩，情不自禁地按欧洲礼节和您拥抱告别。

达赖喇嘛：（大笑）这样的事情……哈哈哈！——

茉莉：我以後还会再来看望您的！再见！

一九九八年五月号——特稿

# 读王力雄《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

 茉莉

达赖喇嘛最初是从我这里听到中国作家王力雄的名字的。那是1998年春天，我去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西藏流亡社区。当时，王力雄的《天葬》刚出版，我托朋友从香港直接寄一本给西藏流亡政府的达瓦才仁。那一本《天葬》在懂中文的藏族朋友中被抢着传阅，人人先睹为快。在和达赖喇嘛第一次会见时，我就谈到王力雄的新书，以及他对西藏流亡政府的宣传所提出的异议。达赖喇嘛立即表示，欢迎王力雄去达兰萨拉访问。

一晃四年过去。虽然我不负使命，曾以私下托人转告和公开报导的方式，传达了达赖喇嘛对王力雄的邀请，但我心里并不存有太多的指望。因为在中国政府眼里，支持西藏等少数民族的中国人，比单纯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更要罪加一等。因此，尽管近年来中国的“西藏热”越来越升温，研究藏学的学者数以千计，但如果不是跟着中国政府谩骂诋毁的话，少有人敢斗胆提起西藏人心中的保护神－－－达赖喇嘛的名字。

没想到，达赖喇嘛后来还真的找机会和王力雄见了面，并且不止一次地真诚对话。在对西藏问题噤若寒蝉的国内知识分子中，这简直是一个异数。不过这个异数可不是太好当，在跨越太平洋飞回中国的旅途中，王力雄是做好被定为“叛国罪”的心理准备的。好在坐牢对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对于不怕坐牢的人，中国政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近年来参入汉藏协会和国际支持西藏运动的活动，对流亡藏人的了解逐步加深，笔者在看了王力雄的《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后，多少有点遗憾。我想，如果王力雄和达赖喇嘛的会见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印度流亡藏人的居住地，那么他对这一问题可能更有感性、具体的认识。

然而，作为四十余年来，国内第一个勇于会见达赖喇嘛的汉族知识分子，王力雄的贡献不小。

第一，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他告诉一直被蒙蔽的中国人，达赖喇嘛走“中间道路”确是深具诚意，从而反驳了把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描绘成“阴谋”的说法。

第二，他提出了一些很有智慧的见解，如，把达赖喇嘛这样在西方深具威望的人放在敌对位置，就是把自己放在西方公众的对立面。这一见解值得中国政府深思。

第三，他坦率地指出了海外西藏人活动的局限："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共产党执政集团分化开来。”并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真实：“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不解决中国问题而单独解决西藏问题没有可能。”对于一些不重视与汉人打交道的西藏民族主义者，这些话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记得2000年藏历新年时，笔者曾在巴黎支持西藏会议上，讲过类似的意思，当场引起一些热爱西藏的法国人惊奇和不满，只有寥寥几个汉学家和藏学家出面支持笔者。与笔者相似，曹长青也曾在不少场合，呼吁流亡藏人重视与普通汉人的接触。

但是，在谈到海外支持西藏的汉人时，王力雄却表现了他观察认识问题的欠缺。他说：“那种支持有点像西方人的态度，不太像汉人，”这话有点一概而论。例如我们“汉藏协会”，几乎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问统独只谈沟通交流”，就在国际支持西藏运动中显出了“汉人”特色。和国内的朋友一样，我们了解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不轻言“独立”。即使是那些激烈支持西藏独立的汉人，不少人也是出于正义感，他们也还是像汉人的。汉人有着各色光谱，不能简单断定谁像谁不像。例如在瑞典，当年支持挪威脱离瑞典而独立的人（如大作家斯特林堡），至今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瑞典人。

王力雄笔下描绘的达赖喇嘛那“一副面对天方夜谭的笑”，笔者不仅熟悉，而且理解其中的含意。尽管王力雄视达赖喇嘛为“宝贵的领袖人物”，说“未来不仅需要达赖喇嘛拯救西藏，而且还可能需要他拯救中国。”但自认只是一介僧人的达赖喇嘛，并不具“问鼎中原”的雄心。对于今天处于转型期的巨大中国，隅居印度山区多年的达赖喇嘛，是否有相当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也是一个问题。

虽然达赖喇嘛不可能像王力雄说的，“把自己放在中国领袖的位置上”，但王力雄这一构想大胆,新颖,极具创意。不少中国人长期被官方宣传所欺骗，至今仍然以为达赖喇嘛是“奴隶贩子”，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于他们，王力雄这一提议显然是振聋发聩的。

笔者认为，最应该被我们中国人所重视的，是达赖喇嘛所传播的和平、宽容的佛教哲学、爱与和谐的东方精神。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不只是属于西藏，更属于中国。王力雄的好主意是：写一本书，给汉人同胞介绍一下达赖喇嘛到底是什么人。笔者早在几年前就怂恿过朋友写这样的书，因为海外生计不易给耽搁了。现在王力雄有这样想法，我们翘首等着他的新作。

以关注解决西藏问题为己任，王力雄的思考是深沉活跃的，其文章中表达的心情是急切的，他的无奈和挫折感也是真实的。在他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拳拳之心。他不仅用其研究成果，而且用会见达赖喇嘛这种勇敢的行动，承担起一己之责。中国需要更多的王力雄式的知识分子，才能共同承担实现人类普遍价值、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才能以一个大民族的胸怀，去聆听弱小民族的呼喊，在不再是铁板一块的中国，开辟出一块自由讨论西藏问题的空间。

（《与达赖喇嘛对话》一书，最近由美国人间出版公司（Green ValleyPublishing）出版，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发行）

2002年4月28日